

分类号：
U D C :

密级：
学号：405000614075

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

明遗民与江西禅门关系考述

Study on Relationship of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and Chan Sects in Jiangxi

熊超

培养单位（院、系）：人文学院中文系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段晓华 教授

申请学位的学科门类：文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古典文献学

论文答辩日期：2017年5月28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夏汉宁

评阅人：

2017年5月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一、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南昌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二、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南昌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南昌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表，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同意按“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 导师签名（手写）：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论文题目	明遗民与江西禅门关系考述						
姓名	熊超	学号	405000614075	论文级别	博士 <input type="checkbox"/> 硕士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院/系/所	人文学院		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			
E_mail	1292236674@qq.com						
备注：							

公开 保密（向校学位办申请获批准为“保密”，_____年____月后公开）

摘要

士僧交游，一直是社会发展史、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士、僧两者相互影响，以至于文人修习佛典、僧人好作诗文屡见不鲜。时至明清之际，朝代的更迭替换，进一步打破士僧严格区分的界限，大批的文人士大夫不仕新朝，托身释氏。江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清廷与南明政权逐鹿的战场，又是南明士人返乡的必经之路。本土孕育的禅门曹洞宗重要派别——寿昌派，发展出觉浪与道独两支，觉浪往江浙，道独往岭南，这两支的弟子又再返回江西，构成了江西禅门发展的整体趋势；而江西本地遗民，热衷佛释的不在少数，自然与禅门僧侣交接，其余坚持儒家思想、严于儒释之别的，也因僧人的“面目”不同往昔，而与之往来。

本文对现存文献进行爬梳剔抉，以方以智、金堡、天然函呈、黄端伯、文德翼、黎元宽等与江西禅门密切相关的遗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行迹、交接，梳理江西禅门在明清之际的发展状况，还原江西明遗民的向禅历程，从而发现明遗民在法系传承、寺院修建、文学创作、山志编修和思想交融五方面的推动作用。在江西禅门这一特定领域内串联起诸遗民，通过文献考证等方法，既涉及这些文人某一方面的研究，也理清江西禅门的发展脉络，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关键词：明遗民；江西禅门；关系

ABSTRACT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scholars and monks,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 Scholars and monks influence each other, so the behavior of scholars studying Buddhism and monks writing poetry are common.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al period, with a change of dynasty, the strictly boundary of scholars and monks was broken.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refuse to serve the new regime and turn into a member of Zen Sects. Jiangxi province, because of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once became a battlefield of the Qing and south Ming regime, also a return path of scholars those fight for south Ming. School of Shouchang is very important in Jiangxi Zen Sects, it develops to Juelang and Daodu schools. Monk Juelang and Daodu move to Jiangzhe and Lingnan respectively, but their followers come to Jiangxi again. This is holistic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xi Zen Sects. As to jiangxi local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some believe in Buddhism, natural associate with monks; others though insist on Confucianism and reject Buddhism, but also associate with monks who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using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wh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iang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for example Fang Yizhi, Jin Bao, Hanxia, Huang Duanbo, Wen Deyi, Li Yuankuan and so on. By analyzing their tracks and Association,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xi Zen Sects in Ming-Qing transitional period, reappear Jiangxi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how to believing in Buddhism, and discover their contribution in sect inheritance, temple built,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ture compiling and thought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study the one part of schola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xi Zen S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writer use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tudy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appear on Zen Sects in Jiangxi.

Key Words: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Zen Sects in Jiangxi; Relationship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1
二、特定词语概念的阐述.....	3
第一章 明清之际江西禅门状况考述.....	6
第一节 明清之际江西禅门发展.....	6
(一) 禅门内部的宗派繁衍.....	6
(二) 遗民使僧侣阶层扩大.....	8
(三) 战乱之下的社会环境.....	13
第二节 僧人行迹与交游.....	15
(一) 浮屠中之遗民——以天然函昱为例.....	15
(二) 遗民为僧者——以今释澹归为例.....	19
(三) 交游群体类型分析.....	25
第二章 江西明遗民向禅历程.....	29
第一节 黄端伯的向禅历程.....	29
(一) 死难及后人评价.....	29
(二) 与僧人的交游.....	31
第二节 文德翼的向禅历程.....	33
(一) 生平及文风、诗风.....	33
(二) 与遗民的交游.....	35
(三) 与遗民为僧者的交游.....	36
(四) 与僧人的交游.....	37
第三节 黎元宽的向禅历程.....	39
(一) 明亡前经历.....	39
(二) 与遗民的交游.....	41
(三) 与贰臣的交游.....	42
(四) 与僧人的交游.....	44
第三章 明遗民对江西禅门的推动.....	48
第一节 法系传承.....	48

目录

(一) 师徒之间.....	48
(二) 同门之间.....	49
第二节 寺院修建.....	51
(一) 修建目的.....	51
(二) 修建行为.....	52
第三节 文学创作.....	56
(一) 心态表现.....	56
(二) 作品迭出.....	58
第四节 山志编修.....	58
(一) 参与主导.....	59
(二) 作序阐释.....	61
第五节 思想交融.....	62
(一) 接纳圆融.....	62
(二) 抵牾排斥.....	65
结语.....	67
致谢.....	69
参考文献.....	71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74

绪 论

一、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目前学界对明遗民与江西禅门的关系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而与之相关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江西佛教和明代遗民逃禅问题。

首先是江西佛教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主要针对明清之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而往往是通史性的，明末清初的江西佛教研究见于其中的部分章节。如韩溥的《江西佛教史》，李勤合、滑红彬的《庐山佛教史》。《江西佛教史》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介绍明代佛教和清代佛教，其中就涉及明末清初僧侶，以及江西遗民黄端伯，虽然都较为简略，但僧侶派系简洁明了。《庐山佛教史》则有这一时期庐山范围内的僧侶活动介绍，并得出庐山佛教在晚明时期的复兴中表现出的特点：高僧大德主持兴复、得到士大夫的支持和襄赞、与岭南佛教关系密切。

其次是与江西有关的明遗民逃禅问题。非江西籍的著名代表是方以智和金堡。尤其是方以智，因其巨大的声誉、丰富的经历以及重要的地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任道斌《方以智年谱》详尽记录了方以智一生的行迹，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更是关注方以智晚年生活，多有新颖之论。汪青的《方以智晚年人生定位研究》和罗炽的《方以智评传》也有方以智生平的介绍，但不出《方以智年谱》《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范围。而封强军《方以智挂锡庐山期间活动述略》则关注方以智挂锡庐山这一特定的时期，曹刚华《方以智晚节考补》以《浮山志》为主，探究方以智与浮山关系，并互证和补充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的若干问题。除生平、行迹外，学界对方以智的易学、庄学思想及《通雅》《东西均》等著述也多有研究。与江西佛教直接相关的则是张永义的《〈青原志略〉成书考》、周锋利的《青原学风与方以智晚年思想》和崔晨的《方以智僧后交游考》，《〈青原志略〉成书考》考证《青原志略》最终成于方以智之手，《青原学风与方以智晚年思想》研究方以智晚年在青原山掀起的三教并弘学风，《方以智僧后交游考》列出了方以智为僧后交往的所有人物，并分为明末遗民、仕清旧友、清初其他士人、宗教人士、师门及门人弟子，其中多有江西人物。金堡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姚良的《金堡及

其《遍行堂》词研究》和胡冰洋的《释澹归交游考》涉及金堡在江西，特别是庐山的行迹。刘雪梅的《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研究》关注逃禅遗民这个群体，并在文中探讨了方以智和金堡的文学理论。

江西籍遗民方面，有关八大山人的研究较多，一般侧重于绘画、书法及生平，关注其与禅门关系的则有萧鸿鸣《曹洞临济两兼之一——有关八大山人与禅门关系的几个问题》和胡迎建《八大山人与禅宗》，萧鸿鸣阐述了八大山人的禅门灯统、世系、禅门思想以及他逃禅、还俗原因等问题，胡迎建通过八大山人的诗与画探寻他与禅宗关系。

而其他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江西籍明遗民，则较少有人研究。个体研究方面，有马将伟的《用世与遗世之两难：曾灿逃禅考论》和成娟阳的《文德翼传记文初探》、吴怿的《文德翼生平著述考》，曾灿是“易堂九子”之一，但为僧后出游江浙，与江西佛教关系有限，《文德翼传记文初探》只关注文德翼传记文方面的文学成就，没有涉及他与江西佛教的关系，《文德翼生平著述考》考证出文德翼确切生卒年，并对其生平事迹和著述版本略加整理，研究空间仍然很大。此外，李精耕的《明代江西作家研究》、肖敏的《清前期江西明遗民社会交往研究》和刘学贵的《明代文人与庐山关系考述》也对这些明遗民有所涉及。《明代江西作家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有黄端伯，第四节有文德翼，第六节有黎元宽，概述他们的生平、著作及诗文特点，虽较为简略，但起到了线索作用；《清前期江西明遗民社会交往研究》第五章第一节论述遗民逃禅与社会交往，以八大山人和林时益为典型，对两人有简单介绍；《明代文人与庐山关系考述》分条列出人物及其有关庐山的诗文，其中有部分人物及诗文与本论题有关。

“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江西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佛教与江西文学、宋明理学的互动结合与发展更是别具特色。时至明末清初，江西的佛教与文学、儒学的结合仍在继续，而王朝的更替，使得儒士多入缁流，江西佛教的发展出现新的特点。本选题的意义在于：一、深入探讨方以智、函惺、金堡等名僧对江西佛教的影响；二、展开关于黄端伯、文德翼、黎元宽等本地向禅文人的拓荒性研究；三、揭示明清之际江西禅门历史、禅宗文化的细致面貌与发展过程；四、使相关文集、山志（寺志）等古籍文献得到发掘整理。

本论文拟研究的问题包括明遗民、僧侶行迹带动的江西禅门历史与发展，外来遗民僧人与本地僧人、文人、官员的关系，本地遗民的生平活动、文集中的与禅门有关的序文、疏引等文章整理。因此，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结合相关史籍、文集发现相关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总结观点。同时，根据研究的问题确定不同的侧重点，如禅门的历史与发展主要运用文史结合，勾勒出线条，呈现出现象；外来遗民僧人方以智、金堡等人研究较多，且与江西佛教关系不大，则忽略以往生平，而关注进入江西以后的活动与交往；本地遗民黎元宽、文德翼等人由于历来研究较少，可发掘的东西较多，应当作较为细致而全面的研究。

二、特定词语概念的阐述

在考述明遗民与江西禅门关系时，有几个特定的词语必须阐述清楚，以确定本文的行文范围和研究内容，它们分别是禅门、明清之际和明遗民。

1. 禅门

汉传佛教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等等，禅宗只是其中一支。随着佛教诸宗的发展演替，禅宗的内在精神和审美情趣与士大夫的内心要求更为契合，所以至宋以后，禅宗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禅宗也因此成为佛教的代名词，明清之际也是如此。^①本文所论述的禅门，特指狭义上禅宗的法派和僧侶，不包括华严、净土等法门。

2. 明清之际

研究明遗民与江西禅门的关系，有两种现象是值得关注的，一是明末士大夫的禅悦之风，一是清初大量遗民的逃禅，由于两种现象具有内在的一惯性，这就使得“明清之际”这一时间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历来研究，对于“明清之际”的界限认定并不一致，也不强求一致，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将这一时间段大致划定为崇祯末年至康熙前期^②，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说

^① 晚明净土宗开始复兴，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梁启超认为：“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二憨山；三蕡益。我们试把《云栖法汇》《梦游集》《灵峰宗论》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梁氏所论，以内在思想和做佛学的途径为着眼点。若从法系发展来看，禅宗仍是主流。

^②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写道：“‘明清之际’是个起止不明确的时段。在这本书中，它大致指崇祯末年到康熙前期。”（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57 页。）

的“明季”实为“明清之际”，指万历至永历一段^①，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论述万历、天启、崇祯、南明三朝、清初顺治康熙几代，时间跨度更大。本文所论述的“明清之际”，根据行文内容，时间大致是从明天启初年（1621）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计65年。

3. 明遗民

明遗民的界定问题，历来宽严不一，一般以不仕新朝为标准，至于是否交接当道则在其次。有立身特严者，如王夫之，匿影深山，不事交接，在当时即获赞誉。也有与执政官员往来不绝者，如今释澹归，虽然当时广招批评^②，但也不妨碍他被纳入遗民之列。本文对明遗民的定义，参照张兵先生的说法：“必须是生活于新旧王朝交替之际，身历两朝乃至两朝以上的士人，不论他们在故国出仕与否、是否有功名，但在新朝必不应科举，更不能出仕；其中如宋遗民入元后曾出任学官、明遗民入清后曾入幕者当不予计较，其内心深处必须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③而人物的设定则依据谢正光编写的《明遗民传记索引》，现将本文涉及到、《索引》中也收录的人物和简介列出如下。^④至于本文重点论述的黄端伯未能录入其中，确是《索引》的一个遗漏。^⑤

序号	姓名	简介
1	文德翼	用昭、灯岩（一作登岩），江西德化
2	方以智	密之、弘智、宏智，僧名无可、药地和尚、浮山愚者、五老、墨历、木立
3	朱议霧（林时益）	变名林时益，确斋，江西南昌（明宗室）
4	宋之盛	改名宋惕、宋佚，未有、白石先生，江西星子
5	金堡（今释）	卫公、道隐，僧名今释、澹归、蔗馀，浙江仁和
6	沈士柱	崑铜、惕庵，安徽芜湖

^① 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写道：“吾兹所论，只明季自万历至永历一段，……”（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② 当代有许多为其平反的文章，可以说澹归和尚的节义观和生死观值得肯定。

^③ 张兵：《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④ 表格内容均摘录自谢正光编《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9、43、57、80、101、123、132、181、182、203、205、223、260、268、273、282、300、304、307、307-308页。

^⑤ 本书的叙例写明：“盖诸君子于亡国之初，虽矢志忠义，而或死于南明党锢之祸，或殉节于清兵南下之际，以致未能成其为遗民者，今悉依本例录入。”（谢正光编：《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黄端伯正是弘光殉节臣子，身跨两朝，拒不事清，份属遗民，这在下文有专门论述。

绪论

7	倪嘉庆（大然）	笃之、朴庵，僧名涵潜、大然无量、笑峰和尚，江南江宁
8	徐芳	仲光、愚山子、拙庵，江西南城
9	陈允衡	伯玑、玉渊，江南建昌
10	陈弘绪	士业、石庄，江西新建
11	曾灿	初名传灿，青藜、止山，江西宁都
12	汤来贺	佐平、惕庵，江西南丰
13	杨大进（今覩）	翰序、无见居士，僧名今覩、石鉴，广东新会
14	黎元宽	左严、博庵、不了道人、褐博，江西南昌
15	钱澄之	初名秉镫，幼光、饮光、敛光，僧名西顽、幻光、右光，安徽桐城
16	谢文淳	约斋、秋水，或以字行，程山先生，江西南丰
17	魏禧	冰叔、叔子、勺庭、裕斋，一名际昌，江西宁都
18	大成	竺庵，湖南醴陵
19	函呈	俗名曾起莘，宅师、天然、丽中，广东南海
20	戒显	俗姓王氏，愿云、晦山、悔堂，江南太仓
21	道盛	俗姓张氏，觉浪，福建拓浦
22	道独	俗姓陆氏，宗宝、空隐老人，广东南海

第一章 明清之际江西禅门状况考述

第一节 明清之际江西禅门发展

明清之际的江西禅门，较之于前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既有禅门内部法系的传承衍替，这主要体现在寿昌派的异军突起，影响遍及江浙、岭南、福建等地，作为发轫之处的江西，自然法席遍布；又有朝代更迭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南明政权反抗正炽、战乱不断时，禅门稍显黯淡，当天下趋于太平，禅门则展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而更重要，也更引人关注的是，外来明遗民在随着明朝覆灭、南明政权的播迁及低潮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匿迹禅门，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并最终在江西停留，身任弘法之责。

（一）禅门内部的宗派繁衍

在论及明清之际江西禅门的发展，寻找这一段时期最近的源头，不能不从寿昌法系说起。明初江西禅门一度兴盛，但随即归于萧条，寺庙塌圮荒芜，豪右侵占寺产之事时有发生，直至明朝末年，即万历（1573—1620）以后，江西禅门才逐渐兴盛起来。明末江西禅宗最为著名的法系当属寿昌派，即使在整个禅宗发展史上，寿昌派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明遗民黄端伯便认为当时盛行的云门、黄檗、径山、天童诸脉，都深受寿昌法系影响，他在《寿昌语录序》中写道：“自寿昌单提向上一路，于是云门、黄檗、径山、天童诸大老祠兴，皆闻寿昌之风而起者也。”^①

寿昌法系的祖庭——寿昌寺，始建于唐朝，唐咸通（860—873）末年，泉南桂琛卓锡此地，至宋朝始称寿昌院，有白云了心禅师执掌法席。明朝又有西竺来公及上首南浦有理等在此弘扬临济宗旨，至无明慧经共五世。蕴空常忠及其法嗣无明慧经是寿昌法派开派始祖，也最为重要。《续指月录》卷十八载建昌廩山蕴空常忠禅师：“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师游喜之，因结茅栖止者二十年，不与人接。诸士绅故人，多来相访，唯默坐而已。罗近

^① 黄端伯撰：《瑤光阁外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0页。

溪、邓潜谷二公，与论性命之学，皆超出情见。”^①《续指月录》卷二十载建昌黄龙寿昌无明慧经禅师：“师住宝坊、峨峰、寿昌三刹，别建庵院二十余所。七旬尚混劳侣耕凿不息。丈室萧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向师道德，深加褒美。每叹曰：‘去圣时遥，幸遗此老。’”^②无明慧经传法博山元来、鼓山元贤、东苑元镜、寿昌元谧、本寂真元、黄端伯，这其中，作为僧侣的博山元来、东苑元镜和作为遗民的黄端伯，对江西禅门的发展影响尤深。

博山元来传法长庆道独，道独传法天然函显。函显曾驻锡庐山，他的多名弟子都与庐山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他们是明清之际江西禅门的重要一环。函显诸弟子除今释澹归外（本文将在后面章节，对今释澹归作专门的论述），其他与庐山有关者有今无、今摩、今辩、今遇、今幡、今渐、今音、今严、今桃等。

阿字今无，顺治十年（1653）随函显入匡山，任栖贤寺监院，为函显第一法嗣。诃衍今摩^③，在庐山鹤鸣峰结庐居住三十多年，听闻山中僧徒悉编保伍后，返回雷峰，为函显第三法嗣。乐说今辩，曾入庐山参拜函显请求薰染，为函显第六法嗣。泽萌今遇，康熙十一年（1672）入匡庐参拜天然，后主栖贤寺法席，为天然第八法嗣。记汝今幡，明亡后从函显受具，后随函显住归宗寺，函显有《送记汝典客随石鉴西堂之栖贤》诗。顿修今渐，曾入栖贤寺任监院。梵音今音，顺治十二年（1655）登具于栖贤，后随函显返回雷峰，卒于华首台。足两今严，外出请《藏》的归途中，至归宗寺，在归宗寺阅《藏》一周，歿于庐山五乳峰静室。见一今桃，据今敞《送见一桃公还匡庐》诗、今严《九日送见一、诃衍入匡山》诗，可知今桃也曾入庐山。

而东苑元镜则传法觉浪道盛。觉浪道盛有嗣法弟子大成、大然、大智、大汕、大权、大浩^④、观涛奇、梅逢忍、巨音选、方融玺等二十七人、记蔚居士四人。觉浪道盛与其弟子的关系往往非常密切，如钱澄之《住寿昌观涛奇禅师塔铭》便记载道：“下金陵谒天界，界方以语录犯时忌得罪，系太平狱，不得见，因

^① 聂先编撰，心善整理：《续指月录》，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97-398页。

^② 聂先编撰，心善整理：《续指月录》，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52页。

^③ 澄归有《临江仙（二十首）·送诃衍兄还庐山旧隐》：“恰似优昙花一现，不容几日盘桓。知君去住自翛然。危峰青侧立，冷着妙旁观。千里可能同入梦，相携紫玉台前。梅花香骨未凋残。谁将明月影，搨在石栏干。”（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④ 黎元宽《寿昌其天大师藏灯塔铭》载：“师住寿昌，提督严公镇于建武，其与师书札往还无虚日者，固以道德也。及其游闽为造祖堂而藩王诸客馆师西禅，顾复有见有不见者，非以利养也。回途至樵川憩瑞光，日与太守汪公为□□，顾侍僧曰：吾不复涉飞禽矣。……师诞于戊辰八月五日，寂于甲辰九月十二日，得世寿三十有七，僧腊二十有三，其受具宝华为乙酉，则齿十八也，皈天界为辛卯，则齿二十四也。”（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上祖堂听素华法师讲法华，久之，遍历讲席，俟界出狱坐栖贤，往叩，……相随七年不去。”^①钱澄之《寿昌其天禅师塔疏》也写道：“自己亥秋杖人辞世，诸兄弟东西分化，禅师私谓余将以片笠把茅，终身匿影，上报师恩。^②”观涛奇禅师跟随觉浪道盛，七年不去；其天大浩在道盛辞世后，终身匿影。正是佛门僧侶这种对师门、对祖庭的重视，才将往来联系推向了广泛化、紧密化，维持了宗派的长远，推动了禅门的兴盛。观涛奇、其天大浩以及梅逢禅师^③都曾住持或栖止于寿昌寺，使得寿昌寺在明清之际这段特殊的时期里，始终不乏高僧名宿，也一直在与明遗民的互动中颇具代表性。

顺治十一年（1654）冬，博山元来八十大寿，天然函呈奉道独之命，入信州博山扫塔，道独自闽、觉浪道盛自浙、三宜明孟自吴赶赴博山，函呈经理博山，让道盛主席。这可以说是曹洞宗寿昌法系这两支的一次重大聚合。

不难看出，寿昌法系在明清之际风靡江南、闽中、岭南等地，但作为发源地的江西，它的繁盛仍然不逊于其他地方。甚至在这一时期的江西，寿昌法系所代表的曹洞宗在江西一枝独秀，力压临济宗。

（二）遗民使僧侶阶层扩大

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不久清军即摧毁起义军，入主北京。这一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所以后来明遗民往往将明王朝的这一次变故称为“甲申国变”。这之后，虽然相继有位于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以及隆武、绍武、永历等政权在继续延续着早已名存实亡的明王朝，但“甲申国变”这一事件对士人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不久，南明的各个政权也相继覆灭。不少曾经仕宦的士人即在这一段时间内托身释氏，其中对江西禅门产生重大影响者有晦山戒显（王翰）、笑峰大然（倪嘉庆）、钱澄之、今释澹归（金堡）、药地无可（方以智）等人。

^① 钱澄之撰：《田间文集》卷二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1页。

^② 钱澄之撰：《田间文集》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③ 文德翼《梅逢禅师语录序》：“庐山梅逢大师，十六岁参浪丈人，既而雪峤老者憩云门遇之，爱其奇隽，从丈人请作侍者，仅十余年，终受丈人付嘱，今海内称大师矣。自天界分席，一止扬州之石塔，载（注：原文如此）止芜湖之兴国，三止瑞州之太平院，顷复止新城之寿昌寺。”（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戒显^①，号晦山，本名王翰，字原（一说元）达，娄东（今江苏太仓）人，年少时补弟子员，曾受业于“娄东二张”之一的张采。甲申国变后，哭庙燔书，从宝华山隆昌寺体禅师剃染，得法于具德弘礼，为临济三十二世。

戒显与江西禅门的因缘源于一场远行。途中，戒显曾寄书信给吴伟业，吴伟业作《赠愿云师（并序）》以诗作答：

愿云二十而与予游。甲申闻变，尝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

晓雨西山来，松风满溪阁。忽得吾师书，别予访庐岳。分携出苦语，殷勤谓同学。兄弟四十余，衰迟已非昨。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末运初违遭，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今观吾师行，四海一芒屨。大道本面前，即是真极乐。他年趺深岩，白云养寂寞。一偈出千山，下界钟磬作。故人叩松关，匡床坐酬酢。不负吾师言，十年践前诺。^②

戒显与吴伟业同学又同里，远游庐山时顺道拜访，并以出世、学道寄言，吴伟业却“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想到“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最后不得不以“不负吾师言，十年践前诺”这样的虚言敷衍，态度极其犹豫，更能看出戒显出世之心的坚决。

^① 文德翼《晦山大师塔铭》载：“显字愿云，别号晦山，太仓州太原望族閭修公季子。……更值京师贼陷，帝后殉社稷，师大悲愤，约同学某翰林逃去，某不果，遂独持衣冠书册辞拜先师文庙曰：翰虽不为罗昭谏，终为饶子操耳。走金陵华山，依昧律师圆顶受具，年三十有五矣。旋侍昧于三塔，辅香雪于上方，平阳恣、固南门、天界盛皆着旧也，招师，师真不往，至高邮地藏见礼和尚。……辞去，游匡庐，慕慧远白社，憩归宗，复坐夏五老，邓元昭太史、徐伯羽太守过访，欲构青莲居之，而云居请疏至矣。师喜天上云居，至则率众耕作，殿堂厨库一时顿新，并营寿塔，期将老焉。过寒溪，复赴安国，主荐福，又受四祖，休汉上兰若，更住护国，历广长，迁疏山，入闽礼曹溪，游青原，甫返四祖。杭州士绅且虚灵隐以迎，灵隐实礼和尚重建也。……师生万历庚戌七月一日戌时，告寂康熙壬子闰七月十七辰时，世寿如此。方至云居，钟自鸣者三昼夜，夜有白光。……得法弟子凡二十有五人，尊遵遗命以全身迎塔于云居常住内青龙窝，左依融师石屋，右拒道容塔基，即师所自卜也。弟子德翼于师为同学旧友，方外至交。”（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714页。）

^② 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7页。

顺治七年（1650年），戒显来到庐山归宗寺，未及两年，即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廿一日，戒显前往云居山真如寺，住持十年。

释大然，号笑峰，本名倪嘉庆，字笃之，别号朴庵、遁庵。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天启二年（1622）进士，累官至户、兵二部正郎，因党事遭祸，被诬下狱七年，后事白还家，起官不赴。甲申国变后，倪嘉庆在南明朝廷任职，但旋即被免职。据张贞生《青原笑峰禅师衣钵塔铭》载：“甲申（1644）南渡，起官秉铨衡，所引皆天下宿望大臣。改户科给事，以误国劾枢辅，寻病免。然睹世界成而坏，坏而成，成而复坏，直若浮沤起灭，知世间事不足为。”^①此时他便有了出世的想法。

顺治二年（1645），倪嘉庆遇祖心函可，并随其薙染，遥礼道独空隐为师，次年圆具于顚愚观衡。笑峰大然出家后，先后跟随觉浪道盛于报恩寺、栖霞寺。顺治十三年（1656），大然进入江西境内，从博山过寿昌，相继有人请主稟山、宝方、景云法席，他一概推辞。顺治十四年（1657）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因道盛寄书信委托，于是驻锡青原，至顺治十六（1659）冬，听闻道盛圆寂，遂曳杖南奔，次年即逝于天界寺。

钱澄之曾出仕南明隆武朝廷，任延平府推官。隆武政权覆灭后，钱澄之于顺治五年（1648）入江西，投寿昌寺皈依阒然大师出家。其《寿昌寺礼阒然禅师》云：“十年行脚路茫茫，落日青山见寿昌。羯鼓破山初入定，狮王开院夜焚香。横拖拄杖看春米，倒捉锄头上讲堂。阅尽艰难胜似细，遮回佛手拜绳床。”^②颇有世事艰难，看破红尘，投身禅门之感。其他如《香饭吟酬韫公见赠之作》《颂寿昌花和邓侍御壁上韵》《看阒然师塔前除竹》《赠智梦禅人》《看僧移花》《暑中同韫公过宝方寺》《访别峰室僧不遇》，均写此时的禅门山居生活。但钱澄之并未作长期的停留，当年秋后，他在经过短暂的禅门生活后，便往粤地投身永历朝廷，继续他的抗清事业。

再往后，桂林战败的第二年，即顺治八年（1651）春，钱澄之身穿僧服辗转回乡，期间途经江西，便又一次路过了寿昌寺。他写有《到寿昌寺毁因入杉关即事》：

^①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② 钱澄之撰，汤华泉校点：《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16页。

着破芒鞋礼道场，惊从劫后睹空王（旧寺烧毁重建）。出家已爽山僧约，蹈海应从估客装。老树再生兵过驿，乱藤牢护雨颓墙。滩头不省双峰贾，嗔怪游人附便航。^①

又有《寿昌卓庵师指如匡庐寻隐辄步来韵》：

前身曾似住庐山，瀑布声中屋半间。来路草深时入梦，当门松偃渐知还。登峰漫许能开眼，绝壁从今且闭关。腹笥可怜书数卷，炉边昨夜已全删。（卓庵力戒予著书。）^②

钱澄之路过寿昌寺时，虽然眼见祖庭凋敝，但正值竺庵和尚中兴祖庭，两人相见，言谈甚恰。竺庵于是劝钱澄之往庐山隐居万松坪，钱澄之以“须送儿归，葬妻毕，始果此愿”推辞，不久便返回老家桐城。

金堡，即今释澹归，是明清之际著名的遗民为僧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明崇祯十三年（1641）中进士，曾任山东临清知州，而后去职归里。崇祯十六年（1643），金堡再获起用，赴任途中，听闻李自成攻破北京、清军入关等事，又再归乡里。弘光朝覆灭后，他相继辗转浙东鲁王监国、闽中隆武、肇庆永历等政权。

金堡在永历朝时颇受争议，并被目为党人。这段史实见于《明史》，《严起恒传》载：“时朝政决于成栋子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五人附之，揽权植党，人目为五虎。”^③然而《舵石翁传》却称金堡“正言敢谏，不避权贵，宰相向有失节者，弹斥不为少假，举朝屏息，遂有五虎之谣”^④。两种记载截然不同，今人则倾向于认为对“五虎”的记述有失公允。^⑤虽然“五虎”之说为谣传，但金堡在永历朝的处境可想而知。

^① 钱澄之撰，汤华泉校点：《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22页。

^② 钱澄之撰，汤华泉校点：《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54页。

^④ 释成鹫撰：《咸陟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9册，第552页。

^⑤ 谢国桢《南明史略》评价金堡道：“当时被金堡等所指责的人，就叫金堡等做五虎，……但就事实而论，五虎中如袁彭年、丁时魁等当然不能算是正派人士；特别是曾经叛变的军阀李元胤之流，也确是跋扈横行，把持朝政；可是金堡、刘湘客、蒙正发等能不畏权贵，直言诤谏，以澄清政治，力挽颓波自任，是符合于人民愿望的，是有其光明一面的。”（谢国桢著：《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随着永历帝赴梧州，政局发生变化，金堡等人即受弹劾。

顺治七年（1650），金堡被贬戍清浪卫（今贵州岑巩），在途中金堡便落发出家。《舵石翁传》载：“狱成谴戍清浪卫，适清兵至，押解走窜，师脱身入桂林茅坪庵，求僧剃度，至是始有浩然长往之志。”^①至顺治九年（1652），金堡入广州，在雷峰海云寺礼天然函呈受具足戒，易名今释澹归。

其后，天然函呈几次归隐庐山，金堡或因探望，或因侍奉，或因迎回，也涉足江西，不可避免地与江西的僧侣与士人有着长期的交游往来。

除王翰、倪嘉庆、钱澄之、金堡外，更为知名，又更具传奇性的遗民人物当属方以智。甲申国变，方以智南奔至南京，但随即于当年八月二十七日被下诏逮捕，而后流寓岭南。至顺治三年（1646）十月、十一月间永历朝廷建立，又始终随永历政权迁移，在半仕半隐之间。顺治五年（1648）冬，方以智入桂林，其后隐居平西山^②，多次辞永历帝辅政之旨。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兵攻陷桂林，方以智剃发僧服，但仍被系于梧州云盖寺，直到顺治九年（1652）才得以脱身，随施闰章北返。施闰章《使粤纪行》中的《度大庾岭》《十八滩》《泰和县》《中秋夜泊樟树镇》，在反映自身行迹的同时，也大致从侧面表现出时方以智在江西的行迹。方以智有《度梅岭》一首，作于此时，收录于《浮山后集》卷一《无生寢》：“此岭原无险，征夫劳不辞。开山留汉姓，凿路识唐碑。但有松千尺，难求梅一枝。古今南北泪，非但为流离。”

方以智经大庾岭、十八滩、泰和、樟树等地，于九月初至庐山。其间他曾谒青原山，据《冬灰录》卷一《（笑老和尚）龛前拈香》载：“药庐出游吞西湖，寄扎寿昌安明窗。别十三年来此堂，黄荆汁点庐陵汤。”^③这段语录作于康熙三年（1664），笑峰之子倪止先请其父龛回白下（今江苏南京）之时。方以智说自己“别十三年来此堂”，十三年前正是顺治九年（1652），与方以智途经江西的时间吻合。

在庐山期间，方以智完全是一副苦行僧人面目，当时檗庵和尚熊开元居庐山，见到方以智，他在《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的序言中写道：“肩大布衲游

^① 释成鹫撰：《咸陟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9册，第552页。

^② 《浮山文集前编》卷九《曾少司马墓志铭》：“余游平西之二年，虔之二曾，以书为其尊君请志铭，余自惟通籍后，即辱与韦庵先生交。”“虔之二曾”，即曾应遴子曾传灯、传灿。此为所见易堂九子与方以智交往最早材料。

^③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行，即以为卧具，别无鞋袋钵囊，亦复不求伴侣，日类十百里，无畏无疲，至使余觌面不相识。”^①

方以智居庐山时，长子方中德、次子方中通至庐山五老峰相迎，随后三人于暮冬离开庐山，经大孤山、石钟山、青山、小孤山等处，最终返回桐城，方以智《浮山后集》卷二《借庐语》有《大孤山长至日作》《下石钟山》《小孤山》，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有《母大人携三弟亦至，相遇于青山舟中》，记录了方以智离开庐山、返回桐城，在江西这一段路途的行迹。

此后，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方以智才又一次登上庐山五老峰，再次进入江西^②，并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禅游江西，驻锡青原，对江西佛教影响深远。

遗民逃禅，是明清易代之际的普遍现象，江西禅门也因此增添了许多遗民人士。从他们为僧后初次进入江西的时间来看，钱澄之是顺治五年（1648），王翰是顺治七年（1650），方以智、金堡是顺治九年（1652），倪嘉庆是顺治十三年（1656），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有如此多的遗民与江西禅门产生交集，无疑扩大了江西禅门之中僧侣的阶层，也扩大士人与僧人交游的广度和深度。

（三）战乱之下的社会环境

清初的一段时期里，从南明弘光朝廷到之后的三藩之乱，江西一直受到波及，长期处在战乱之中。以金声桓的降清与叛清为例，不难想见时局的动荡。南京的弘光朝廷垮台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领部将金声桓、王得仁等投降清朝，并扣留九江总督袁继咸，送清军邀功，而后袁继咸就义。清朝政府派金声桓、王得仁等引导清军进入江西，经九江攻陷南昌。清顺治五年（1648）正月，明叛将金声桓、王得仁又兵据南昌，用隆武年号，在江西反正，但旋即于次年正月遭到清兵剿平。同时，江西各地的起义也是此起彼伏。直到康熙朝，又有三藩之乱。

明遗民的一些记载，如徐世溥的《江变纪事》和文德翼的《遇兵记》等文

^①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熊开元隐居庐山的事迹罕见于其他材料，《明史》也只是提及了熊开元为僧居灵岩寺之事：“未几，京师陷，福王召起吏科给事中。丁母艰，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给事中。连擢太常卿、左金都御史，随征东阁大学士。乞假归。汀州破，弃家为僧，隐苏州之灵岩以终。”隆武出奔汀州在顺治三年（1646），熊开元于此时出家为僧，其于顺治九年（1652）在庐山，但起止时间未详。

^② 方以智次子方中通《陪诗》卷一有《老父眼阙，行脚西江》诗。

章详细而生动地表现了这段时期的史实。而僧侶在此时的一些遭遇，也能从文献中找寻到许多记载，因此不难想像这一系列事件对僧侶的影响。

如燕雷元鹏，熊维典《燕雷和尚塔志铭》载：“至燕雷师之末年，士氛大恶。修江衣带水，夜旦风雨相持，而南陬为甚。禅院隔绝，不通闻问。……塔毕，亡何，而岁在丙辰（笔者注：丙辰为康熙十五年，1676年），山氛猖炽。师瓢衲之外，别无长物，遂得晏然于锋镝中。是时，环山诸刹，上下居民，自唐宋以来著姓旧宅，悉遭虐焰。而师独与数十人俱，如荼坚守，诸过常住者亦相戒不犯，卒得龙藏岿然，乔木森秀。”^①碑铭撰于康熙十九年（1680），所记之事当在三藩之乱时。

又如观涛奇，钱澄之《住寿昌观涛奇禅师塔铭》载：“旋赴寿昌之请，寿昌者，师祖庭也。近杉关，当江闽之孔道，闽乱时，兵贼往来如织，更递屯口，不时入寺，以搜间为名，诸僧惶惧，或走匿，师戒曰：勿动，动则常住碎矣。命开三门，披衣，领大众百许人礼佛诵经，威仪钟梵如常。将吏入门，皆敛足注视，久之，叹曰好和尚。敕军士无所扰，寺得全。兵去，门外杀伤遍地，师率众敛尸瘗之。又疫疠大起，避兵死者满山谷，师一资以药饵，饿者给以食，寿昌左右全活者亡虑千余人。”^②战乱虽然不起于江西，但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仍然对江西有所波及。

这是通过他人文字反映当时僧人所处环境，而天然函呈自作的多首诗篇，感情真切，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情境。

康熙十三年（1674），函呈归隐庐山之时即逢三藩之乱，时耿精忠在福建与吴三桂会师攻江西，南康有警，函呈不得不归返雷峰。他在《生日前一日闻南康戒严》中写道：“生日今年异去年，连宵风雨忽晴天。山中岁月无新故，世上兴亡迭后先。万古云霄高着眼，千峰林木独成眠。（是如来入空三昧时节。）平观总是刹尘事，回忆当时已惘然。（不堪回忆。）”^③其他诗句如《入岭道中寄诃衍、角子、泽萌、广慈、作金、圆湛》：“庐岳于今已劫灰，白云流水尽生埃。”^④《酬谢邺门、许二菱二文学》：“已分匡庐埋老骨，干戈万里促行尘。”^⑤更是用“已劫灰”、“尽生埃”、“干戈万里”等醒目的字眼，表现战事的紧

^① 释一诚主修：《云居山新志》第六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335页。

^② 钱澄之撰：《田间文集》卷二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1页。原文漶漫不清、墨涂处，用“□”表示，下同。

^③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56页。

^④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56页。

^⑤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56页。

急与残酷。

而当函呈返回广东两年之后，三藩之乱仍在继续，函呈所作之诗也就不乏对战事的感慨，江西的战乱又一次呈现在他的笔下。《秋兴八首（丙辰海云作）》第三首：“三十三秋污祖席，前年七夕始移茅。干戈匝地惊林木，居食从天笑斗筲。入海已深龙鳌蛰，望山犹隔虎狼咆。高峰雪月何生事，泣向西飙作解嘲。”

^①第九首：“闻道荆门未解兵，九嶷秋色对溢城。（千里如见。）僧归湖上无消息，（望煞人。）客到虔州有战争。（争奈。）三载孤踪怜踯躅，一楼明月带欃枪。（孤踪明月，心境各别。）逢人但问西江水，日下黄尘蔽乱营。”^②

当然，战乱带来的是破坏与萧条，而在相对和平的一个时期，比如顺治六年（1649）金声桓身亡之后，至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前，这一段时期及其前后，江西禅门的发展，不论是佛教寺院的兴修，还是士僧之间的交游往来，均表现出一种较为活跃的态势。

第二节 僧人行迹与交游

作为禅门中的主体，僧人的重要性毋庸多言。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恰好使遗民、僧人这两种身份有了交集，自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以来，“遗民逃禅”一直是相对热门的词汇，逃禅者被称为遗民僧。而另一类兼具这双重身份的人则未免落寞，他们在明朝即已经出家，入清后以遗民自居，这类人被称为“浮屠中之遗民”^③。本节便以天然函呈、今释澹归两人为例，重点考证遗民僧和“浮屠中之遗民”在江西的行迹及交游情况，同时，为更加突出遗民僧的含义，以示与“浮屠中之遗民”的区别，称遗民僧为“遗民为僧者”。

（一）浮屠中之遗民——以天然函呈为例

^①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158-159页。

^②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59页。

^③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下编里引用全望祖《鮚埼亭集》卷一六《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的内容：“退翁本国难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别有至性，遂为浮屠中之遗民，以收拾残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将明末为遗民，入清后以遗民自居的人称为“浮屠中之遗民”。当然，现在有些研究也将这类人径称为遗民僧，他们在研究遗民僧时写道：“另外还有些僧人，于明亡前便已经出家，虽是佛教中人，却难忘君父大节，明亡后的行为与一般遗民无异，这些人也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张夸：《清初吴中遗民僧及其文学研究》，西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6页。）

天然函显，字丽中，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本名曾起莘，字宅师，番禺人。少负才名，十七岁补诸生，与乡人梁朝钟、黎遂球、罗宾王等交游。崇祯六年（1633）中举人，崇祯九年（1636）得两广总督熊文灿举荐，崇祯十三年（1640）上京应试，舟次南康，入庐山归宗寺，求宗宝道独削发为僧，法名函显。明亡后，历主番禺隆兴寺（即海云寺）、庐山栖贤寺、华首、海幢、丹霞诸刹。康熙二十四年（1685）卒于雷峰海云寺。函显所著《瞎堂诗集》录张维屏题天然和尚像赞，张维屏称其“是明遗老，是名孝廉。是二是一，亦儒亦禅。六祖五派，其一曹洞。师阐宗风，法徒最聚”。可以说，天然函显是典型的“浮屠中之遗民”。其人是明遗民，其弟子亦有属明遗民者，其人与其弟子，对江西尤其是庐山禅门影响最著。

天然函显于庐山归宗寺祝发出家之事，见汤来贺《天然显和尚塔志铭》：“丙子冬，谒道独和尚于黄岩，往返叩击，针芥相投。……己卯公车复上，舟次南康，值独和尚移锡归宗，诣求祝发。先是，诏行保举，师以大臣交荐，当得美官，乃谓‘选官不如选佛’，弃犹敝屣。”^①崇祯九年（1636）和崇祯十二年（1639）的这段往事，是函显一直难以忘怀的。顺治十年（1653）他抵达庐山住归宗寺后，作《礼金轮峰舍利塔》诗，次年又作《甲午四月八日再礼金轮峰舍利塔》，金轮峰舍利塔是道独禅师埋骨之地，函显两次礼拜并作诗，表达的正是怀念先师之情。

而在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函显又一次抵达庐山时，作《初住归宗四首》，第二首云：“吾师舍利在金轮，四十年前话转新。不道无禅谁独念，祖翁天地久生尘。（予自丙子礼金轮塔，便有三十年不出山之约。）”^②至明年正月四日，登金轮峰礼如来舍利塔，过道独掩关处，见栋宇倾落，茆檐颓圮，作《题金轮峰塔院四首》，有“落叶归根他日事，只今谁与续前因”，将庐山视为终老之地，函显的其他一些诗也往往表达出这一意愿。后来函显派其弟子角子和尚住金轮峰塔院，以作自己归老之处。^③

函显在庐山第一次长时间的驻锡是在顺治十年（1653），他侍奉智母师太

^①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3-14页。己卯应为庚辰，《明末天然和尚年谱》已辨其非。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汤来贺访和尚于净成。

^②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204页。

^③ 函显《归宗山籟》云：“院后遗残屋，吾师旧掩关。且教口子住，吾欲老投闲。”

入庐山，有弟子今无、顿修今渐偕行。函呈先住归宗，次年秋移居栖贤，主法席，命顿修监寺。

对于未在身边的弟子，函呈颇为怀念。例如今释澹归，此时正“度岭乞缘于江左”^①，募建寺院。函呈作《道中忆止言、澹归》：“匡山计日至，京口望人来。几时同到岸，扶我一登台”；《到归宗，怅止言、澹归未至》：“匡山不易到，之子滞江城。更忆临岐话，难为旷别情”；《顿修、三决之镇江，寄候月鹭兼促止言、澹归诸子回山》：“闻君在京口，我已到匡庐。信息凭诸衲，寒温懒作书”；《寄止言、澹归》：“有约金秋返，相携五老前。知尔南中苦，怜予海外偏。溪声僧梦稳，江色客心悬。且归就禅寂，休计买山钱。”^②这四首诗先是写于往庐山的道中，后又写于到达归宗时，地点在变换，感情也发生了转变，由开始的“忆”到后来的“促”，甚至于带点“怨”。

顺治十五年（1658）春，函呈因身体多病，加之思念禅侣^③，自栖贤还雷峰，今摩、今音、今印^④随行。

康熙十年（1671）秋，南康太守廖昆湖暨归宗阖寺大众，启请天然函呈主席。当年十二月，函呈抵山，作《初住归宗四首》诗中既有对祖庭、师门的怀念，又有对弟子不理解的感慨：

东晋开先代有人，复生松转劫前春。遥似八十年来事，艰钜难辞是此身。（寺重兴八十年，予始忝主方丈。）

吾师设利在金轮，四十年前话转新。不道无禅谁独念，祖翁田地久生尘。（予自丙子礼金轮塔，便有三十年不出山之约。）

岭南猿狖自丹霞，柳栗横挑千里赊。多少儿孙怜老大，不知何地是吾家。（余受归宗请，诸子想留，至于绝裾。）

最是堪伤法运衰，门庭通显作生涯。欲持一勺鸾溪水，洒向诸方热

^① 释成鹫，《舵石翁传》，《咸陟堂文集》。金堡《刻袁特丘总宪轶诗序》：“腊八日，余受菩萨戒，……甫三日，余出岭，为深隐匡山计。”（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一），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应该即指此事。

^② 以上诗作均录自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70-71页。

^③ 函呈《还岭南道中得阿字长安书》：“多病已拚匡岳去，因人复向海门归。”（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17页。）

^④ 今印，字海发，顺德人。……丁酉，至匡山，礼天然落发受具。旋随天然还粤，复返匡掌记室，……（汪宗衍撰：《明末天然和尚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页。）

面皮。^①

在归宗时，函是曾于康熙十一年（1672）应今覩请至栖贤说法。又从山中觅得乐趣，悟到禅法，作《归宗山籁》一百四首，他在自序中说道：“年来痛戒门下，除旧习《鲁论》，以其所近应酬世谛，姑不在禁。……老僧固习《鲁论》者，设禁以来，不作诗文三年于兹矣。自归匡岳，乃有《山籁》，由其天有所甚乐，故其赖有所自鸣也。天籁贫，故其籁以贫鸣，天籁拙，故其籁以拙鸣。贫与拙皆山性也，性既山，其籁亦山，是山籁所由发欤。”^②

至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函是退院住栖贤，并卜隐紫霄峰之净成，随即因三藩之乱而离开庐山返回雷峰。途中，函是寄诗在庐山的诸弟子，作《入岭道中寄诃衍、角子、泽萌、广慈、作金、圆湛》：“庐岳于今已劫灰，白云流水尽生埃。荒榛待辟谁堪守，（亏着作金、圆湛。）新竹成阴我再来。绝食自甘同大众，避人何惮走千回。（尽天地是个人，作么生避。）一生一死寻常事，（也有人面如土色。）珍重寒溪雪夜杯。”^③函是决定“新竹成阴我再来”，并未食言，再来庐山，已是四年之后。

康熙十七年（1678），函是再返庐山，以净成为掩关处，常登双镜楼^④，过往较密的弟子为尘异、玉泉，有多首诗作提及两人。如表现与尘异往来的诗有《与尘异论及姜山，慨然有作》《还庐山与尘异第一次对雪二首》《与诸子赏牡丹用尘异韵》《己未仲冬十一日，计尘异当以此时度岭，率题长句一章》《尘异、广慈呈对雪诗，用韵和之》《送尘异但子掩关》《九日同尘异登双镜楼》《尘异献菊》等等。表现与玉泉往来的诗有《初冬示玉泉侍者》《掩关净成，玉泉入候未见而返，次日呈诗，即用其韵答之》《玉泉呈雁字诗》等等。

函是的第二法嗣今覩，经营庐山栖贤寺多年，在这一年逝世，函是作《哭石鉴覩子》：

八旬万里望寒原，依仗山堂笑语温。欲启蒋生当日径，俄招宋玉百年魂。孤松日暮怜归鹤，断壑春深泣夜猿。从此掩关忘岁月，不知谁是

^①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203-204页。

^②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89页。

^③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56页。

^④ 康熙《庐山志》云：“栖贤寺东有净成精舍，后有双镜楼，僧函是建。”

我儿孙。^①

又作《读石鉴遗诗（戊午七月三十日）》：

读罢遗诗意惘然，中间离合总堪怜。沥干热血难寻梦，欲趁余生直上天。几回后事悲前事，安得今年是去年。顾我掩关惭已晚，闲春休更落中边。^②

今辩撰函呈行状云：“师暮年为法求人，心焉益切，每谈及先宗，泪即沾襟，期诸后起，如地藏之遇清凉，圆悟之得妙喜，庶几无憾。”足可见函呈对后起之秀的期许，弟子今覩的逝世，对函呈的打击可想而知。

因当地官员要将僧侶编入保伍，康熙二十四年（1685），函呈不得不返回岭南。《天然呈和尚塔志铭》记载此事道：“会有宰官欲以世法绳诸刹，乃返雷峰。”^③他的《乙丑初春即事》：“守拙匡徒五十年，未尝俯仰向人前。访予携手谈松下，送客扶筇揖涧边。老卧千峰忘贵贱，病移深谷废周旋。自知有过随云水，不敢逡巡累后贤。”^④即是对他庐山生活的总结和自己当时心境的展示。

（二）遗民为僧者——以今释澹归为例

顺治九年（1652）金堡入广州雷峰海云寺，从函呈圆具，法名今释，号澹归。是时，函呈欲移居庐山，三日之后金堡奉命募化于江左。顺治十一年（1654）冬从江左归，至庐山栖贤寺。澹归《四书义自序》对这件事叙述得极为清楚：“十二月，甫进戒，从止言阿阇黎出岭，为匡山长住计。过彭蠡，涉扬子江，侨居晋陵。甲午至琴川，驻锡贯清堂。冬还栖贤。明年春，谒两老人于万年，充书记。”^⑤

函呈在康熙十年（1671）驻锡庐山后，澹归虽远在岭南，但两人多有书信往来。澹归的多篇书信中，均有请函呈返回岭南的内容：

^①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62页。

^②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62页。

^③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4页。

^④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版，第187页。

^⑤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一），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角子所与栖贤密札，以方丈一席委曲郑重，正是缓着，……则与其挂堂头之虚名，不如理化主之实事也。且和尚受归宗之请，嘉与后昆，宁非盛事？今释窃以为和尚住归宗，亦不能久安，则何不以归宗为正宅，而以丹霞为别院，进则天飞，退则渊潜，绰有余裕，庶为得策。使数年之后，正宅安如泰山，然后遣一介之使，使今释奉补处别院之命，未为晚也。

自客冬和尚赴归宗请，水云林木，声色黯然，山中僧行，凄断无比，正似婴儿失乳，长夜不旦，所望旭日回光，慈母顾复，度日如岁，何止三秋！即丹霞护法，上自刘大中丞以及粤东四众，无不咨嗟，以为重云既临他土，甘雨不霪此方，遽失福田，咎在职责。至于孝山太守思念之切，又不待言。今释等洒扫庭除，栽培薪木，炷香虔祷，屈指归期，伏愿和尚不恪慈悲，俯垂盼睐，早还岭内，曲慰舆情。况螺岩塔影，渐酬负铁之怀，岂玉台松子，不攀复生之例？今释等临笺可胜翘企之至。

及门人弟子无不望和尚早还，首座孝思尤为笃摯。伏祈密示归期，以便料理，庶得遂侍奉之欢，兼免忧悬之切，想兹念不遗，必有以慰此拳拳也。

某愚见，以为和尚寿算必至期颐，料此际已当勿药，但年高体弱不宜更劳心于建立；而目前诸子亦未有能住归宗者，何不径如遵旨所云，以无住之心，成旅泊之迹，遨游于别传、海幢、雷峰之间。^①

澹归多次催促函呈返回岭南的原因在于，他当时正在经营丹霞山别传寺，打算以此奉养函呈。其实丹霞与江西，仅一庾岭之隔。澹归在《与归宗雪草监寺》中便说道：“仆奔走丹霞十余年，本为老人休息之计，归宗横出相延，遂使初念不遂，不能无余憾于请主。未知老人还岭当在何时？海幢侍者往，幸一相闻，以便料理奉迎，想不讶其换夺也。”^②急切之心溢于言表。澹归当日送别函呈赴庐山后，还山之语也颇耐人寻味，《语录》载：“大庾岭送老和尚赴归宗。还山，示众：‘诸兄弟，我今释十年奔走，料理此山，原为老人休息之计，却被归宗特地相延。譬如凤翔千仞，不顾蓬窠，龙归沧海，莫存牛迹。仔细简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05页。

^②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点将来，纳了一场败阙。为什么如此？出家儿索尔虚闲，少求少欲，我便镇日上门，向人惹得满脸灰尘，一身荆棘，如今回出岭之行，策还山之杖，向绿玉潭中洗净面皮，与诸兄弟相见，分些澹薄之苦，寻些寂寥之乐，不敢道茅茨石室任运过时，且图做个香火道人，大家团圞寄诗，然后一瓢一笠，听我所往。”^①直言自己“镇日上门，向人惹得满脸灰尘”，却“纳了一场败阙”，澹归的多次催促自然不难理解。

虽然如此，但金堡在忙于营建丹霞山别传寺的同时，并不推辞为归宗乞援之事，其《归宗乞米疏》写道：“天然老人在庐山，某身充化主，亦非分外，既有丹霞未了之事，即无分身之能，然有笔舌可分，于义固不能恝也。似石上座见老人之焦劳，悯大众之枯澹，发愿行乞，幸诸君子以周急之心，作斋僧之德。予略为似石分笔分舌，即似石略为予分身，盖心安而义协。”^②与函呈的师徒之情，与石鉴的同门之义，仍是澹归的主要情感。

康熙十二年（1673）秋，函呈病重，今释便在当年冬季至匡山省视。^③次年新春，两人游山，函呈作《新春偕澹长老游玉帘泉》，今释作《齐天乐（归宗侍天然老人游玉帘泉）》：

摩天峭壁无门入，谁将玉帘低挂。石榻闻涛，晴窗看雨，莫觅龙潭
高下。金轮忽驾。映一朵卿云，缤纷娇姹。让出扶桑，水中生火不能画。
人人同注异指，见烟飞电闪，如幻如化。绿晕灯儿，白光珠子，青赤虹
桥斜跨。欢情未罢。便空里裁花，方开方谢。剩有余辉，饶双眸激射。
(悬泉如练，见五色光变幻恍惚，因人指注而为名状，盖日色所映耳。)

^④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②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一），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273页。

^③ 澄归《答严玉寰提督》：“顷往庐山省侍本师老人，乃弟子家庭之职，非敢辄闻左右，……”（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与史庸庵太守（六则）》：“弟顷往庐山，候本师老人之病，恐归期当在明春。”（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与马子贞太守（七则）》：“弟以本师老和尚抱恙，特往庐山省侍，大抵明年春正月乃得还丹霞也。”（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具体年份可见于《语录》：“是壬子年九月，山僧与中丞相别。到次年夏间，山僧大病一场，冬间奉老和尚呼唤，前往归宗。今年春回至南昌路上，又是一场大病。”（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

^④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澹归在《与旋庵都寺》中写道：“《玉帘泉》一词奉寄，此稿不曾留之归宗，乃庐山一行，归宗师友一日之乐也。”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应该即指此词。澹归还有《甲寅新正二日，侍天老人同诸及门游玉帘泉》诗。

当三藩之乱波及九江时，天然天函是否安处，也使得澹归挂念。他在《与解虎监寺》中写道：“近闻湖口阻塞，星渚、吴城一带为兵火所残，念老人与大众未免受惊，为之惘然。”^①甚至建议今摩侍奉函呈南还，至丹霞避兵：“战争之警初闻，大隐山林亦不免扰攘，十方子孙，势无两立。昨晤郡邑诸公，知旧住处有烦言，则此中情形，尚须调剂，幸吾兄深察机宜，无致横决。粤东犹为僻壤，丹霞尚可避兵，若不便安居，则竟奉老人南还，亦未为失策也。”^②

正如澹归经营着丹霞山别传寺，延请天然和尚主席，以此奉养一样，今覩石鉴也经营着庐山栖贤寺，为天然归隐谋划。澹归《栖贤石鉴覩禅师塔铭（有序）》详细记载了今覩经营栖贤寺之事：“甲辰举西堂，领众之栖贤。栖贤为老人匿影匡山地，破屋数间，不避风雨。师欲恢弘光大，奉迎老人，提唱之余，筭米盐，营土木，早作夜思，劳瘁无倦。戊申，老人居丹霞，师以庆生至，适长庆再请住持，老人命师代。往仅半载，旧住稍僵蹇，曳杖径归栖贤。阅十年，每以祖庭未扩，大器未成，弘誓未践，拊心呕血。师素病怔忡，屡发益剧，至是且不起。戊午春三月之闰，老人自海云复至，师喜甚，霍然似无患者。请以院事属角子□和尚，而身侍老人，朝夕与同参谈道论文，以为生平乐无逾此乐也。俄中寒疾，七日而没。”^③澹归写给今覩的书信中也可看出今覩对经营化缘之事的关心：

相邀不过聚谈，既为缘事关心，便可需之后会，弟亦即还山，俟明年更相见也。……十五夜江舟对月二词漫寄，……彭钟老自是胜流，能为栖贤作大护持，尤快，为致区区。不尽。^④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② 《与诃衍摩大师（五则）》。（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③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澹归《题石鉴和尚遗墨后》称赞石鉴：“石鉴和尚字出于苏，诗出于王孟，见地超迈，说法峻迈，然一往蕴藉，多风人之致。”（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④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澹归有《忆旧游（栖贤访石鉴兄）》：“廿年前在此，问廿年前，何似今年？岁寒人将尽，融融晴色，初试春天。玉渊金井依旧，白练曳苍烟。却精舍孤清，闲僧素朴，我见犹怜。群游忽惊顾，想好句垂成，花散青莲。莫写扁舟影，叹来思异感，归梦同牵。有泉亦号三叠，此曲近无传。妙旨发玄音，移情又在三峡边。（拟游三叠不果，立春初晴，仅策杖三峡洞，寻玉渊诸谭，坐话而已。）”（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澹归与石鉴都有经营道场的经历，实有惺惺相惜之感，所谓“一种苦乐，自家知自家受，不可以语人”，正是对同道之人才说得出：

云中行时，弟在韶州冗极，不能更作书。此间局面，往来者皆能悉之，皮毛骨肉，各随所见，只料理丛林人，一种苦乐，自家知自家受，不可以语人。弟与阿兄数年入此三昧，料吾兄在栖贤亦不能出此三昧也。春候兼暖，伏惟道体胜常。弟倾至岭头，措置少许田事，一口钵盂，或出江，或出楚，摇摇未定，俟有消息，更遣闻也。秋末冬初，免不得长老峰前一场欢聚，诃兄不可不来，此在吾兄分内也。^①

这种情感在澹归的《祭栖贤石鉴覩和尚文》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写尽了荷担之苦：

呜呼！缘不胜而勉为担荷者，弟与兄是也。当其担荷，即不计缘，及其缘不胜，不能不顾担荷，则力俞劳，心愈苦矣。弟曾与兄坐玉渊潭上，请兄弃此一席，兄固疑担荷之道未尽也。弟入岭，复寓书，谓古人亦有散众之事，何必住院？若径来丹霞，不少虚堂依仗，二三兄弟举古论今，亦震旦中不易得之乐。未知兄意从违，而江路已梗阻矣。丁巳秋中，弟退院，自计瓢笠过栖贤，当邀兄为汗漫游，作登临语笑之侣，未几闻兄病，未几闻兄长往，伤哉！……缘不胜者，强有力宜混迹劳侣，文弱则佐从席，掌笺翰，不然阅大藏经典，不然教习童行，如此而已，勉为担荷，徒自劳苦。^②

除此之外，两人自然也会谈及函呈：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②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弟入岭，复寓书”中的“书”当指澹归《与栖贤石鉴覩和尚》：“知庐山近状，虽干戈之苦已息，而粥饭之缘甚难，每与阿兄共此挂念，以为吾兄宜扁舟入岭。诸方每每散众，盖时势使然，亦不消定要有个住处也。弟住丹霞，只似不曾住者。乐说在此，与其晨夕，甚乐。吾兄肯来，不少虚堂依杖，大家团圞，举古论今，此乃末法希遇之事，弟不遣一化主出门，但与大众吃干澹饭耳。”（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吾辈作事，能尽心而不能免过，然信已而行，不复置怀抱间也。老人既不肯归，弟惟有照旧料理，作请老人之局耳。^①

雨解来，得手札，具如面谈，甚慰。知老人九月初入栖贤，极好，吾兄须二十分孝顺，勤补前过也。^②

或是应酬赠答。石鉴曾一度离开栖贤驻锡岭南，返回栖贤时，澹归作《寄赠石鉴覩兄退长庆院还栖贤》：

随肩榔栗去留轻，到处青山足送迎。验取铜头铁额老，洗教金井玉渊清，千华座下衣还绕，七佛峰前鼓自鸣。谁道红尘曾有路，从来不见一人行。^③

澹归的《与栖贤大众》更可视为他与江西佛门关系最直接的材料，更符合他僧人身份以及法门传承：

长庆祖庭，支撑门户，乃是我辈分内事。首座大师既挑着海幢担子，不可卸肩，某料理丹霞，服侍和尚，亦无推诿处。权于缓急远近之间，藉重石大师，盖出于万不得已，即大师一番承当，亦出于万不得已。栖贤道场既费数年心力，不但大师不忍中废，即诸兄弟戮力同心，喫尽辛苦，大师亦岂忍中废以相辜负耶？濒行惓惓顾盼，再四丁宁，惟望诸兄弟大家照旧经营，倍加勇猛，勿因大师暂有睽离，便使玉渊金井寂寂笑人也。衲僧家兴隆三宝，元是分内事，亦不必定靠着善知识当头，若能一片至诚，忘身为法，有始有终，自能感格龙天，号召檀护，庄严道场。使长庆得大师阐扬，栖贤得兄弟修举，两彩一赛，绝后光前，异时奉迎大师，重临三峡，指点门庭，更无开口下手处，岂非法门中不朽盛事，有待于诸兄弟勇猛承当者耶？某非今秋即明月，为请藏之举，定一入山，与诸兄弟盘桓，不但不负诸兄弟，亦不负大师惓惓于栖贤之意也。惟是建立丛林，先须和合，万勿以意见不同，增长人我是非，忘大局而兢小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②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③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嫌，致有离心离德，使大师远在三山，又起牵挂。此则某所僭进狂言，为不必然之虑耳。临书祝切，惟为众珍重自爱，不尽。^①

虽然驻锡于岭南，但澹归数番来江西活动。他甚至将庐山视为自己的归骨之地，其主因便是师门法系，《与徐健庵太史》中写道：“寄迹半塘，遂逾五月，……已决意还庐山，归死于丛林师友之手，藏骨普同，不更占檀那寸土矣。”^②在给今覩的信中也写道：“手示至，知法体渐愈，甚慰下怀。更出栖贤，自是正着，亦俟秋凉图之，旗鼓老兄领众时已交付下也。劣弟乃有告老之兴，明春请藏归途，便入栖贤，按行壁垒，吾兄头巾虽已扯破，若退缩不前，当更以一顶破头巾举罚，此亦老人正令也。”^③

故其康熙十七年（1678）出岭请藏过庐山时，澹归除了作《悼栖贤石鉴覩兄（四首）》外，便是与同门商谈居庐山之事，有《与鹤鸣摩兄、栖贤口弟谈卜居匡岳之事（二首）》：

住院如退院，入山休出山。老僧当此际，二与四之间。润月寻峰上，林烟罩地还。雨余无虎踞，深夜莫留关。

鹤鸣峰顶啸，橹断水边诗。老不能登顿，贫兼守拙迟。矮篱垂雨叶，曲涧颺晴丝。记得村居里，鸡鸣犬吠时。^④

（三）交游群体类型分析

无论是浮屠中之遗民，还是遗民为僧者，从他们的行止来看，息影深山、默修佛法者有之，频结善缘、广布禅道者自然也不乏其人，而对于后一种僧人来说，则更能从他们的交游往来中，全面具体地分析出这一批人与江西禅门的关系。僧人、官员、士人，以及这一时期较为特殊的人群——遗民，这四者相互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交游往来。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151页。

^②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③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与诃衍摩大师（五则）》也有会面之语：“今秋明春，有请藏之举，当一入栖贤，即策杖奉访，若在归途，或径步后尘，未可量也。”（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此次请藏在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澹归《与姚媒长主政（三则）》云：“弟去秋有出岭请藏之行，适老人赴归宗，复为山中兄弟所留，去则决去，尚俟他年。”（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④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僧侣之间，在上述的天然函昱和今释澹归两个例子中，不难发现他们交游往来的多样、复杂，这自然是由他们的僧侣身份决定的。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遗民，却让人难以想到他们与当地的官员也保持着极其广泛的往来。如天然函昱，他的《瞎堂诗集》中便收录不少他与九江官员应酬的诗篇，《秋日游白鹿洞，时督学邵公、太守伦公重修书院，赋呈伦公二首》《许明府逸林过夜话，次早陪上净成，有诗见投，率笔奉答》《伦太守宣明、许明府逸林祀匡庐，便道见过》《早春周贊皇郡丞携二子并吕、胡两文学见访》等等，都归属于这一类。

方以智住持青原时，交游往来的众多物里，也不乏官员的身影，为此还使得他的好友魏禧和徐芳纷纷写信以劝告。魏禧《与木大师书》：“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群衲之推奉，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夫观时以行权者，豪杰之事；全身任道，圣贤所不废。师之出此，识者犹将谅其所不得已，而今则既三年矣。禧粗览佛书，从来吉德，于道行法明之日，往往挂鞋曳杖，灭影深山，后世莫不高其行，譬犹神龙云中，偶见爪甲。”^①徐芳《寄木公四（丙午）》：“但不知道兄将来大意，将深山乎？如有意深山，则茅篷尺地，何处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办？如是，人人愿为主人，不但弟与惕庵矣。……故弟以为道兄将来所处，尚宜审择。夫出而劳孰与退而逸，且道兄今日又有宜深山不宜高座者，此可意喻，不可以言传也。”^②

施闰章和于藻是方以智过从较密的两位官员，施闰章时任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管辖临江、吉安、袁州，于藻时任庐陵知县。他与两人颇有渊源，永历朝廷桂林战败后，方以智被清军所系，施闰章从中斡旋，使其得以北归，于藻的父亲于奕正则是方以智是故交。身为当地官员，除与方以智交游往来外，两人还对青原建置的兴修有所贡献。施闰章修葺五贤讲堂、置“圣域”、“祖关”二坊，建仁树楼，于藻也在青原山建晚对轩，与方以智在此观景吟诗。

士人也是僧人交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以今释澹归和萧孟昉为例，澹归的《与萧孟昉明经（四则）》，有诗文之间的交流，“丹霞有诗数章，汇为横卷，弟僭跋于后，聊为研邻现作饮光三舞，大地琴声想同此倾耳”；有斋僧之

^① 《魏叔子文集外编》卷五，转引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版，第248-249页。

^② 《悬榻编》卷五，转引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版，第246-247页。

事，“供僧四事，乞食固难，乞衣尤为罕见，非吾兄世为三宝护法，深通菩萨之道哦，岂能乐成。愿特发胜心，多方擘画，使之满愿而归，则丹霞大众寒时寒杀，热时热杀，此又吾兄豁开顶门眼，别行一路神通也”；有对款待的致谢，“病中不能奉谒，承注念惓惓，款留调治，云天高谊，未尝忘也。濒行捐惠，愧负滋深。涂中仗庇，粗获宁帖”。^①

萧孟昉热衷佛事，常聚集僧侣，庐陵一带佛门也颇为兴盛，故澹归有《戊申中秋，孟昉招同周瑛庵、施伟长、程大匡、王一肩、戴圣则、罗万年、杨彦升诸公，筇崖、中千、平远诸师，小集遯园》^②《自遯园月下归，更预亦庵普茶》等诗。

作为明清之际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遗民们也与僧侣有着不可忽视的交游，这种交游自然是两方互动的，有遗民表达对僧侣景仰的，也有僧侣表达对遗民敬佩的。江西遗民汤来贺作《天然呈和尚塔志铭》，谈及与函呈的交游：“予与师道虽不同，然曩宦粤时已心仪师。后复游粤，访师于东莞芥庵，为予言儒佛异同之旨。比入匡庐，又访师于净成。予于师固渊明之与慧远也，其敢辞铭！”^③而函呈有感于黄端伯殉国，作《黄司李元公殉义（讳端伯，江西人）》：“品行文章第一人，曾随匡岳忆前身。分明学到无生处，博得浮名答久因。”^④对黄端伯的赞誉极高。

澹归的诗中也能或多或少看出与遗民往来的信息，虽然这些往来并不立足于禅门。如《赠杨榴庵》：

匡山有遗民，逸宕饶英风。秉质贵独异，举足嫌雷同。六翮手自铩，
不作摩天鸿。观其自謙篇，次骨求心宗。知我来虔州，朝夕能从容。投
林或曳屣，过水兼扶筇。我犹习麤行，一钵擎虚空。相对各萧然，致雨
吾非龙。远客怜近客，两者皆奇穷。来朝顺流下，更问陶皮翁。归舟欲

^① 澄归《研邻偶存序》：“戊午新秋，舟次南昌，候萧子孟昉于郡署之寓，阅《研邻偶存》，为之心折。俗薄时危，贤者所宜匡救，是故有不言。言而无益于人心，有损于圣教，其获罪在千百世。”（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 页。）《题孟昉扇》：“孟昉为蜚语所中，留滞洪都，拟便道候之，舟抵市汊，早被连人押到。且喜不差跬步，相见欢甚，却胸中隐隐各有不得自由处。孟昉日望研邻，未得即归，予请藏半涂，又逢拦截，咫尺彭蠡，无片板可渡。”（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四），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4 页。）

^② 澄归有《赠西昌萧孟昉》《遯园》《周瑛庵过访》《留别大匡》《留别瑛庵》《云州重别孟昉》等诗。

^③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6 版，第 13 页。

^④ 天然和尚著，李福标、仇江点校：《瞎堂诗集》，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6 版，第 194 页。

相携，下榻螺岩中。老僧亦无根，铁船驾千峰。落帆时触石，墨脚还摩松。与子一长笑，老大成童蒙。^①

这种交游也就使得部分遗民自愿护法梵刹，栖贤寺的修复便是多方努力的结果，单就明遗民而言，住持栖贤寺的天然函呈、石鉴今覩和远在岭南的今释澹归而外，江西本地遗民黎元宽出力颇多，澹归说他“不遗余力”，从他撰写的募序和缘起里，也可看出他护持栖贤寺的决心。《募兴栖贤寺序》载：“澹归既为之舌，而须识梵者为之足，祖生范公为之手矣。余又将使宰官将军居士长者，尽为之头目髓脑，樵渔贾贩兵民各为之毫孔。”^②《募大兴栖贤寺缘起》载：“余他日亦为天然和尚一饶舌矣。会和尚返雷峰，事中寝，而石鉴大师补于此，既及其书抵余曰：某幸得饮招隐泉一杯，第稍饰坏楼以为法堂，藏阁尚未周备，至于佛殿厨库坊廊，概乎未举，振起绝业，能无望于两足大人？今壹使知客古鹏化之而予文之，子不可让。”^③

以上便是遗民僧侶在江西交游的概况，他们所接触的人物，有遗民，也有僧人、官员、士人。在一系列的往来过程中，明清之际的江西禅门呈现出一片活跃景象。而函呈驻锡庐山归宗、栖贤，澹归行脚江西，石鉴经营栖贤道场，正是在江西禅门发展的广阔社会背景下，生动而具体的代表。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05页。

第二章 江西明遗民向禅历程

第一节 黄端伯的向禅历程

黄端伯，字元公，又字符公，自号海岸道人，建昌新城（今江西黎川）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南明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父黄九德，曾任建德县令。黄端伯年轻时有志于性命之学，不欲科举，应其父之命，才出应有司。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任职宁波府推官，崇祯五年（1632）丁内艰归，崇祯八年（1635）移补杭州，崇祯十年（1637）丁外艰。甲申国变后，经姜曰广举荐，擢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次年南京城破，八月十三日因拒不降清而死。著有《易疏》《瑶光阁集》《还乡集》《庐山集》《东海集》《明夷集》。今所见《瑶光阁集》及《外集》，便是后人合《瑶光阁集》《还乡集》《庐山集》《东海集》诸书而成。^①方以智论其易学成就：“居恒举六经，归之于易。每申引李伯纪历然分别、寂然一体之旨。所著《易疏》，独善京房，本之商瞿，创为图说，贯穿错综，敷变皆合。”^②

（一）死难及后人评价

黄端伯生平最重大的事件便是拒不降清而被处死，此事也最为后人所赞许。《明史·张慎言等传》载：“福王立，大学士姜曰广荐起之。明年三月，授仪制主事。五月，南都破，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捕系之。阅四月，谕之降，不从，卒就戮。”^③而对于黄端伯就义的细节，历来的记载则颇具传奇色彩，多数重在表现其临死不惧、舍生取义的气节。《居士传》卷五十一载：“我兵下南京，元公方寓能仁寺，榜其名于门，遂被逮。大帅者，元公同年友。谕降不从，欲以善知识礼全之，亦不许。居狱中，作《明夷录》以见志。既，大帅复

^① 黄祐《重刻瑶光阁集序》载：“乾隆己未，余丁先嫡母艰归里，读礼之暇，爰取正集先以付刻，仍之曰《瑶光阁集》，而《还乡》《东海》诸诗附焉，不复区别。《庐山集》皆佛家语，并入外集。”（黄端伯《瑶光阁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4页。）

^② 《礼部仪制司主事黄公墓碑铭》。方以智撰：《浮山文集后编》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页。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48页。

遣骑谕降，不从。乃引出通济门外，过水草亭，元公北面叩头，坐受戮，颜色不变。行刑者惮之，举刃辄手颤，堕其刃，易卒，亦如之。元公厉声曰：‘何不刺我心！’刺其心，乃死。”^①

后人对黄端伯的评价大多可以归为“忠义”二字，只是对于殉难的忠义之举，与他的佛教思想是否有关系，奉佛者和秉持儒家正统的士人因彼此其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见解。

奉佛者将黄端伯的忠义归为佛家超出生死的观念。黎元宽在《蔡忠襄公小传》中写道：“蔡公之于学问，可谓大醇而无小疵，然亦闻其颇究心佛乘。死于忠者，岂得不谓之出生死者耶？余友黄海岸盖其俪也。”^②虽然是评价他人，但将黄端伯归为同一类人，也可视为对黄端伯的评价。《居士传》说：“蔡、刘诸先生，俱现身儒门，皎然于生死之际，其入道之由不可诬也。经言：‘菩萨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其诸先生之谓乎？”^③黄端伯在南明任职与死难时，所作的诗偈便反复言说生死，如《明夷集》中收录的《六月二十六日别家人》：“义士何忧死，忠臣不爱生。只留方寸赤，千古现光明。”^④这些诗偈，正是黄端伯了然生死的体现，也不妨视为他进行自我激励的一种手段，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

李绂则站在儒家立场上，直接对“了生死”的观点予以批驳，认为这是“天性”。他在《瑶光阁》序文中表明了这种态度：“或因谓佛氏能了生死，故诸君子能舍身以殉国，此大谬不然者也。忠义天性，故不待外求，圣人之书，又反覆训示。孔子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谓：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由是得生而可以不用，可以避患而有所不为。深切若此，而乌事彼教焉哉？……欲以禅师礼之终不屈，则先生于佛学固不屑矣。先生学佛时署私印曰海岸道人，盖楞严经谓引诸沉冥，出于苦海，而俗僧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说，先生意取诸此。晚年磨去印文，改镌‘忠孝廉节’四字，则尤悔悟之确证也。可谓死事得力于佛法者哉？”^⑤李绂认为黄端伯“于佛学固

① 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 2000 年版，第 279 页。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146 册，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1 页。

③ 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 2000 年版，第 282 页。

④ 黄端伯撰：《明夷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93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 308 页。其余诗偈，《居士传》和《五灯全书》均有收录，像南京城守时所作：“巍巍不动寰中主，一座坚城似铁山。刀锯在前无怯志，只缘勘破死生关。”临死前所作：“四大原无我，消归烈焰中。红炉焰灭处，遍地起清风。”“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身处，刀山是道场。”较之《六月二十六日别家人》，更能看出禅门思想的意味。

⑤ 黄端伯撰：《瑶光阁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93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 172-173 页。

不屑矣”，意在将黄端伯与佛教分离开来，也即《四库提要》中所说的“委曲回护”之意。这样一种评价，表明的是儒者对忠义归属问题的态度，也是对明末以来严明儒佛分际的继承和延续^①。同时，李绂认为黄端伯殉国的行为“固已高出药地道隐之上”，贬斥方以智和今释澹归，也是站在儒家鄙夷佛释而发出的观点。

（二）与僧人的交游

黄端伯居廩山时随寿昌慧经修习佛法多年，但真正参悟是在旅泊庐山之时。他在《寿昌语录序》中写道：“余承事寿昌十载，不识寿昌。丁卯旅泊庐山，偶遇归宗半偈长老，策我参禅，夜坐开先，疑团廓落，始会寿昌举处，狂叫不休。大众，元公勘破老婆禅了也，且道还有佛法也无，还有宗乘也无？”^②天启七年（1927），黄端伯在开先寺参禅而开悟，“狂叫不休”正表现了他当时的状态。甚至之后考取进士、为官浙江时，仍将所到之处视为庐山，《庐山集自序》载：“余旅寄庐山之开先，突发狂病，笔妖墨怪，祸乱世人。既至北都，则曰犹吾昔者之庐山也，既至东海，则又曰犹吾昔者之庐山也，天台雁荡处处相逢，岂因缘已定耶？”^③

在旅泊庐山之后，黄端伯忽生大病，在寿昌寺静养，病中便欲出家受菩萨戒。他在写给博山和尚得书信中明确表明了这种愿望：“弟子素承提诲，未得入门，客冬憩息开先，推倒葛藤椿子，喜极欲狂，而米熟欠筛，令人吞吐不下，大师何以相济也？近为病魔所虐，大命几倾，静养寿昌，气息粗接，猛省前事，俗念都厌，解下幞头，长与空王，为弟子而已，拟欲受菩萨戒。”^④但这次黄端伯并没有出家为僧，其原因当如方以智《礼部仪制司主事黄公墓碑铭》所载“建德强之，乃出应有司”，遵其父之命。

^① 赵园认为“并非到了明亡，才有关于王学、禅学的由节义方面的批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到异代之际，在王学中人、禅悦之士已有大批殉明之后，这种批评态度仍被坚持了下来，且以为更应有一份警戒。”（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② 黄端伯撰：《瑶光阁外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9页。其证道偈曰：“更深夜静绝行踪，月上匡庐第一峰。谁意髑髅崩裂处，等闲灭却少林宗。”

^③ 黄端伯撰：《瑶光阁外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83页。《与余集生开府》载：“端伯宴息庐山，为魔所着，扬沙撒土，作三教之罪人，急思返住庐山，推倒葛藤椿子耳，当以来岁图之。”（黄端伯撰：《瑶光阁外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3页。）

^④ 黄端伯撰：《瑶光阁外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2页。

天童、雪峤是黄端伯在宁波和杭州为官时过从较密的僧人。交游的内容大致是参悟佛法和礼请驻锡寺院。

参悟佛法方面，对黄端伯影响最大的是天童圆悟，《天童山祖堂记》载：“始余师事寿昌，痛领锥札，庐山月夕，撞破钟楼，及宦游四明，亲近天童法席，夜阅《华严·觉光明品》，始明雪峰古镜因缘，动步发言，了无滞碍，然后知古人心用之全也。”^①黄端伯因亲近天童圆悟，使自己在佛法修为上更为进益。

礼请驻锡寺院方面，他曾请雪峤圆信驻锡庐山开先寺，文德翼《开先山鸣璐禅师塔铭》载：“忆余乙亥（笔者注：崇祯八年，1635）从海岸先生访雪峤大师于径山，当是时，天童法席甚盛，付嘱多人，师瞪视霄汉不屑也。丛林以高峻孤冷目之，不敢相亲，而璐禅师得为入室弟子。厥后，海岸先生请主庐山开先，大师欣然一至，西堂则木陈，领院事则曹源。无何，归云门，以开先付源，且付璐师，屈指盖四十年。”^②在明清之际，开先寺先后有雪峤、曹源、石涛、山鸣诸禅师住持，灯火不绝，和黄端伯有很大的关系。

除礼请雪峤驻锡开先之外，请天童驻锡归宗的记载也见于黄端伯的文集之中。他曾寄书天童大师，希望天童与自己共同居于庐山：“端伯栖隐山中，日与木石为伍，门风淡薄，殆甚穷僧。今年贫始是贫，信矣。明岁将辞徒侣独上匡庐，白鹿黄龙，待命已久，大师能无意乎？归宗法席久缺主人，昔年坐断金轮峰，元是天童老汉大师，亮不靳再来也。”^③

黄端伯是寿昌无明慧经门下弟子，在他交往的僧人之中，自然有属于寿昌系一派的，包括閻然和同门博山元来、鼓山元贤、寿昌元谧等人。《寄閻然关主》：“龙安之额，敢烦侍者致辞，十道紫金光，只在一毫端示现矣。寿昌铜钟已有次第，总藉三宝威神之力一气呵成，法音流通，手手相授，吾师声教且遍满十方矣。张子学已成方，为吾道树帜，并闻。”^④《候博山书》：“恭闻博山和尚说声头禅，坑陷大地众生丧生失命。近欲邀过归宗禅刹，提唱宗风，为赤眼大师出气而群生福薄，请法无缘，遂令龕行沙门埋没当初斩蛇手段，然大

^① 黄端伯撰：《瑤光閣外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3页。

^②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八，《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16页。

^③ 黄端伯撰：《瑤光閣外集》卷一，《四庫全書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6页。

^④ 黄端伯撰：《瑤光閣外集》卷一，《四庫全書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6-297页。

众皈仰已久，终须坐断金轮峰耳。”^①《答永觉贤公》：“博山迁化，法道寂寥，正思重弄琵琶为寿昌老人出气，乃不意法兄所论先契我心，然时节因缘不能不待之来日也。溢公长老禅悟甚深，法兄倘肯过临，自当抚掌大笑耳。”^②《閑然禅师语录序》：“余尝求宗匠于今时，而心服溢公之大用也。公于临济棒下发明本来，而韬晦丛林，屡推不出，偶有一言半句，皆端伯虔请而后示之。”^③均是黄端伯与寿昌系僧人往来的相关材料。

虽然身为明遗民，但黄端伯在清顺治二年（1645）便已逝世，主要的生平活动集中在明朝末期。他与当时在江西盛行的寿昌法系因缘甚深，又礼请天童、雪峤等浙江僧侶驻锡庐山，是士大夫禅悦者中典型人物。黄端伯向禅的原因，与明末文人禅悦之风盛行，新城、庐山禅门寺院林立不无关系。而他在抗清失败后的选择，诠释了江西禅门的忠义内涵，为明遗民对遗民之志的坚守起到了示范作用。

第二节 文德翼的向禅历程

文德翼，字用昭，一字鍛崖，号灯岩，德化（今九江德化）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年未详，清康熙十二年（1673）仍在世。于崇祯七年（1634）中进士，十年（1637）授嘉兴司李，十六年（1643）任司銓，未就任。文德翼著述较多，有《宋史存》《佣吹录》《读庄小言》及《雅似堂文集》《雅似堂诗集》《求是堂文集》等书，涉及文、史、百家诸类，钱澄之评价他“于十三经廿一史之书，盖不啻寝食而沐浴之矣。□及宗门教乘，皆能辨别源流，而得其指归之所在，即百家诸子，以至稗官野史，无不语焉极详，而择焉极精”^④。

（一）生平及文风、诗风

^① 黄端伯撰：《瑶光阁外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2页。

^② 黄端伯撰：《瑶光阁外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3页。

^③ 黄端伯撰：《瑶光阁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6-297页。

^④ 《文灯岩诗集序》。（钱澄之撰：《田间文集》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甲申国变后文德翼归隐不仕，常常以自己的远祖文天祥和同乡陶渊明砥砺气节，这在《报招抚书》中写得很明白：“某苗裔何人？文宋瑞也；乡里何人？陶元亮也，既不能死，何忍言仕！”^①对于遗民生活的凄清与寂寥，文德翼也不乏悲苦之情：“呜呼，余渐齿摇发白，抱区区之朴学以希乡人梅尉陶令之所守。一时朋友零落殆尽，即方外之交，可与言道理性情者，百无一二。”^②虽为遗民，但他也参与了修撰《九江府志》，此事即发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③

身为遗民，文德翼的文章既有慷慨激昂、触犯当时忌讳的，也有广引曲喻、艰深其词的，钱澄之认为他的文章：“固有慷慨激烈，犯当时之忌讳而不顾者；不然，则广引曲喻，泛滥于古今事物之典、天人之故，旁援释老之书，下及稗官野史，迁其义，艰深其词，以寄其所欲言，使识者相遇于义言之外，而昧者不知也。呜呼，苦矣！”^④

而他的诗则更具特色，并且明显与明亡以前风格迥异。钱澄之说他明亡后诗文特点是“少引典故，多任天真”、“顾一出于柔澹平口，其题亦不过游览闲适，与诸故人宾友赠答唱和之作，盖取法于靖节”，以冲淡为主。又转引陈大樽的评价，说他明亡前诗文特点是“恻隐温厚，源于二雅；而广引曲喻，有屈平之遗风”。由恻隐温厚、广引曲喻到天真柔澹，一改以往诗风，正是文德翼有意为之。他在《熊木升诗集序》中写道：“余尝观元诸君子，实宋遗民也，或以诗行于朝政，或以诗仿于乡比，似戏而实庄，似欢而实痛，至今尚能道之。……余于是叹元之诗禁宽，诸君子尚能放意如此。岂与夫负影只立，或一二同心哭深山、沦幽涧，不敢出其诗以示人者比哉？”^⑤诗风的转变，其实是在清初文网严密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① 转引自钱澄之《求是堂集序》。（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田间文集》卷十三，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33-235页。）

^② 《修圣果寺序》。（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447页。）

^③ 《九江府志序》载：“今天下同文，大修郡志，甚盛举也。太守汉阳江公口以命不佞翼典其事，翼壮不如人，今老矣。……德翼仅一书记，弭不律供，隃糜以从事，朝夕为役，曾无一劳获。”（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张孟常书经辨序》载：“越三十又五年，岁在癸丑，与孟尝同修通志于西江之贡院。”（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④ 《求是堂集序》。（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田间文集》卷十三，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33-235页。）

^⑤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二) 与遗民的交游

与文德翼交游最密、并对其影响甚深的明遗民莫过于黄端伯，两人的交游集中于明亡前和南明初期一段时期。

黄端伯与文德翼的父亲文士弘相识。文士弘，字元任，别号三瀑山人，曾治讲所，聚徒数百人。^①黄端伯游庐山时，便曾拜访文士弘。《文三瀑先生序》载：“余客游庐山，雅闻浔阳文先生高行，特造其庐而请教焉。先生葛巾布袍散步林下，五日授余食，孺人主餐蔬食菜羹，素风无替，余欣然乐之。”^②

文德翼入京应试之时，曾拜会黄端伯，黄端伯对其寄予厚望，以他作为周敦颐、陆九渊的继承者和再兴者看待。黄端伯《文用昭稿序》载：“初得用昭闻牍，心甚爱之，理境幽深，包含无际，而传以古人之韵，超逸绝尘，窃意为象山流亚也。及用昭入谒，格整而仪庄，神韵潇疏，然自得称说濂溪象山之学，津津不休。余闻其语，见其人，而叹圣道之有托也。用昭出示诸艺，冲淡萧散，若无意为文者，而神理深至，寻绎不穷，所谓躬行而心得者，其庶几矣。先是，入闱之夕，梦一书生来谒，自称为陆象山之徒，及接用昭，风仪恍符夙梦，然后信鹅湖之学将待用昭而大昌也，用昭勉之哉。”^③期许之情溢于言表。当文德翼不被主司赏识，黄端伯寄书信劝勉，认为他当以性命一宗为大事，不患无赏识之人，同时托其在庐山觅一草庐以归隐。^④

南明弘光小朝廷覆灭之后，文德翼与黄端伯两人均在南京，声气相投，共同坚守遗民之志。黄端伯被羁押狱中，文德翼收藏从狱中流传出来的黄端伯所

^① 文德翼《先考敕封文林郎文公墓志》：“府君讳士弘，字元任，先世庐陵富田人，信国忠烈公嗣也。鏞金治讲所曰鸚鳄馆，岁月从事，聚徒恒数百人焉，又退而筑草堂三间，颜曰补过，日夜自观省焉。性好周易，危坐斋中，体认拈句壁间云……府君爱匡庐三叠瀑布泉，别号三瀑山人，巡抚江西都御史长沙郭公都督学时，崇祀府君于学宫，门人私易名为安节先生，与紫阳楚望后先辉映濂溪于九江矣。”（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03-704页。）

^② 黄端伯撰：《瑤光阁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26页。

^③ 黄端伯撰：《瑤光阁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6-247页。

^④ 黄端伯《与文用昭》载：“伯白。足下非一代之人，而千古之人也。周陆之学，且待用昭而再兴焉，岂仅仅博一进贤冠而已哉？罗公转示手书，知佳卷已遭识者，而竟不得当于主司，非足下之有负于主司，乃主司之有负于足下也。匣中龙剑，夜作雷鸣，何患无识宝之人哉？性命一宗，乃吾辈出世一大事，何有于一科之名进士也，惟足下勉之。不佞素性谨讷，未尝敢以大言欺人，然明白现前，亦不忍埋没真正豪杰也。庐山据吴楚之上游，秀甲天下，不佞慕周茂叔遗致，将挈家隐于其中，足下为我觅一草庐，俾可以容膝，斯善矣。山谷之间稍远城市，则地僻而屋直廉，大约费止二三十金，或可勉强以俸资相补，若再修则不能矣。不佞入山之志甚急，足下幸速图之，虎溪三啸，将再见于来年。亲到庐山，然后信此回不是梦也。”

（黄端伯撰：《瑤光阁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98-199页。）

著文集，并经友人建议，最终梓行。文德翼《□□集序》载：“先生喜从浮屠游，治其学甚深。余尝叹禅门阔大，托宿颇多，未免贤不肖混淆，君子小人贸乱，若名节烈忠增光佛乘，前则张子韶，后则先生二人而已。□□一集，从者得自狱中，余褒藏之，友人……素事先生，请出梓行，目以愧后世之事君而怀二心者。呜呼，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①

黄端伯另有诗《赠文用昭归浔阳》《仲冬邀文用昭、刘叔道、萧尔器、智上人同过啸园夜饮二首》，可作为两人往来的佐证。两人由最初的师友学问之交，到后来的遗民气节之交，是随着时代变换而衍化出来的新的内涵。以上是两人交往的主要方面，但两人对于佛门之事的交流，虽然材料较少，但也不容忽视。文德翼游吴越时曾对黄端伯说：“庐山法窟也，即如开先拾枯松煮布水，高风益冷矣。”言下之意是庐山佛门冷清。这件事也就促成了黄端伯请径山和尚主席开先寺。又如，文德翼在评价黄端伯殉难之事说道：“余尝叹禅门阔大，托宿颇多，未免贤不肖混淆，君子小人贸乱，若名节烈忠增光佛乘，前则张子韶，后则先生二人而已。”^②一方面反映了自己对禅门贤不肖混杂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黄端伯以名节烈忠增光佛乘的赞扬，这也与后世对黄端伯的评价相一致。

（三）与遗民为僧者的交游

遗民为僧者与文德翼往来较多的有钱澄之、方以智（无可大智）、王瀚（晦山戒显）、金堡（今释澹归）等人。

文德翼与钱澄之两人的往来材料多见于序文，侧重于诗文创作的欣赏。除上文中钱澄之对文德翼诗、文的评价，文德翼也有这方面的序文。对于钱澄之作诗骂五老峰招之不来，他在《钱饮光西江游草序》说：“余心交饮光日久，顷始见面于西昌，颂其游草，知此骂亦不易得者。……饮光巍然丈夫，不作儿女娓娓私语，壁立千仞，殆与五老并肩矣。”^③赞许了钱澄之诗文不为软美语的独特风格。

^①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356页。

^② 《□□集序》。（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356页。）

^③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文德翼与方以智的往来则侧重于游览山水。康熙元年（1662），文德翼与方以智、徐芳、汤恪素、魏平仲、傅用兹等人游从姑山，作《游从姑山记》。康熙六年（1667），文德翼至南城谒知县苗蕃，两人共寻徐芳，至景云寺，见徐芳正供方以智午斋，汤恪素、何观我、杨东曦等人均在座上，遂订游麻姑山，文德翼的《游麻姑山记》详细记载了订游之事及游览过程。方以智还曾约文德翼同游九漈，见《墨历禅师游九漈诗序》：“师约余游九漈，时方示疾，过而问之，已荷杖而先往矣。归而寄诗二章动余，且命为引曰：疾良已。”^①可惜文德翼因病未能同行。

同样喜爱游览山水的晦山戒显，也自然成为了文德翼往来的对象。晦山住云居山时，文德翼即欲从之游，但并未如愿。此后，晦山四处行脚，路过东、西林和柴门，两人才得以交接。《云居晦山师楚游序》便记叙了两人相识的经历：“晦师方息匡庐，旋移欧岭，如是者六年，仆欲从之游而未得也。儿子行偶遇之归宗，荷其开接，兼念枯株朽木，竟非素昧平生者，盖欲从之游而卒未得也。今年春，师适楚过憩东西林，急命篮舆，获接晨夕，如三生石上，忽见故人，欣慨交集，不自忍禁。秋杪，师自楚口口过柴门，再口前绪，更为依依别去，私自恨曰：安得无上云居如古人一粥缘也。”^②文德翼有《请云居晦翁和尚住东林启》，但从戒显的具体行迹来看，并没有赴东林寺住持。

在诗文欣赏和游览山水之外，文德翼与今释澹归的往来则涉及禅门寺院的修建。澹归曾以护法栖贤之事相托：“今石鉴大师新膺付嘱，来圆此话，不说祖祢不了殃及儿孙，却道灵山护念全凭檀越，想居士悯祖道之寂寥，坚固心、广长舌，与大悲千手千眼，一时并到三峡涧前，发大光明而作佛事也。”^③

（四）与僧人的交游

虽然文德翼自称“余非学禅者也”^④，但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仍然不乏与禅

^①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②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③ 《与文灯岩铨部》。（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4页。）

^④ 《古拙禅师传灯序》。（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门往来的事迹。文德翼十五岁时，便上庐山拜谒憨山德清，憨山德清教他不分章读《中庸》法，令其读至万遍。文德翼如法读之，不敢忘。十五六岁时，又跟随父亲游至庐山金竹坪千佛寺，观览了开山和尚恭干、续芳遗像，及荆王请书、李太后所赐紫伽黎，他悚然起敬。在浙江游历、为官时，更是遍参天童、径山、金粟、浮玉诸尊宿。

后来隐居庐山附近，文德翼常与学浮屠而狷洁者往来，他在《掷笔庵无得募引》中说：“犬马声色以及仙佛，皆术士借以取金钱，而浮屠之祸福为甚。然世亦有学浮屠而狷洁者，庐山之中得数人焉。石照、石生、木陈、履初、匡云、知幻，皆与仆游十余年矣，日绝不言金钱。”^①从《求是堂文集》里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西林古嶷、初逎悦安、开先曹源、古水、绿雨、匡云、寂融自真等人，与文德翼均有往来。

西林古嶷是天童下三世弟子，文德翼游历浙江时便与其相识，《俞昭和尚语录序》载：“余壮游吴越，曾谒天童，天童三世莫不敬礼，闻声相思，惟有灵岩，而捋灵岩虎须者，获友二人焉，一曰西林古嶷，一曰洪山俞昭。”^②古嶷于顺治十二年（1655）入庐山西林寺，顺治十四年（1657）示寂，在西林寺住持三年，文德翼在这三年里从其游，“莫窥其蕴，然心未尝不钦其机用之大也”^③，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古嶷与晦山相见，文德翼“从拂椎边覩看，未拈竖时，欲一伸喙，便觉落第二义”^④。

开先曹源与文德翼也相识于浙江，后曹源随雪峤至庐山开先寺。顺治二年（1645）仲春，文德翼造访开先，两人相与坐龙潭久之，至顺治十一年（1654），文德翼再次造访时，自己“患难衰白”，曹源先是不识，而后惊咤不已。顺治十七年（1660）曹源迁化后，其同门石涛和尚请文德翼撰写塔铭。

东林寺寂融自真，号唤鍊道人，曾文德翼为自己辑录的《庐山东林接存》四卷、《东林近集》一卷作序。康熙二年（1663），文德翼过东林，唤鍊又请他为先师大郴和尚撰塔铭，为自己作小传。

绿雨禅师与文德翼有关于诗与禅、与山居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文德翼认

^①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②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430页。《求是堂文集》卷十五有《请俞昭和尚住西林启》。

^③ 《庐山西林开法第一世玄禅师塔铭》。（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708页。）

^④ 《西林古嶷禅师语录序》。（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为“人生因缘一事耳，禅一事也，山居亦一事也，诗又亦一事也”^①。绿雨禅师则认为不可生分别，不可将禅、山、诗截然分开。

文德翼与僧侶多有往来，与他将佛家的自利利他和儒家的仁爱思想等同起来看是分不开的。他在《黄梅雨昙庵记》中写道：“余谓释教之自利利他，与孔子之己立立人、己达人，岂岐（笔者注：疑为“歧”）旨哉？使学佛者明心见性，坐视众生入火宅、溺迷津，而不一入手焉？固不可谓能仁而利他矣。”^②这其实是一种圆融儒释的态度。

文德翼与僧人交游同样始于明末，又和黄端伯交往较深，受其影响也大，这一影响包括与禅门僧侶的交游和对遗民之志的坚守。故明亡后，与文德翼交游的僧侶中，部分便带有遗民性质，即使是普通僧侶，也是“学浮屠而狷洁者”。而交游的内容则侧重于游览山水，他的诗风便因此转变为冲淡自然，反映了遗民交游与文学的一个方面。

第三节 黎元宽的向禅历程

黎元宽，字左严，号博庵，南昌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父黎道炤，曾任工科给事中，因直言犯事被贬为桐城县令。黎元宽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先后任工部主事、兵部车驾司郎中，崇祯六年（1633）出任浙江提学副使，崇祯九年（1636）罢官。明亡后，绝意仕进，在谷鹿洲构草草庐，每日与弟子讲习研磨周秦以来古文。顺治初，有人向朝廷推荐黎元宽，黎元宽以母老推辞。著有《进贤堂稿》二十八卷、《进贤堂诗集》五十卷。《进贤堂诗集》今未见，清初姚佺所辑《诗源初集》豫章部分首列黎元宽，选其诗《所怆》《赠客》《耳病》等十一首。

（一）明亡前经历

黎元宽在浙江任学官时，提倡古文，以善诙谐、能容人闻名，很受浙江士子欢迎。俞长城为《黎博庵稿》所撰题识云：“黎博庵先生视学吾浙，历年六

^① 《绿雨禅师和柏堂山居诗序》。（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②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575页。

十余年，长老犹能言其概。先生曾督杭州关务，左挟簿书，右操图史，不自居俗吏。故下车之日，士林翔舞。遇士期，士子以文就质，即面定轩轾，商榷剏切，宛如家人。待人坦率和易，有一生请曰：‘规例求宽。’先生答曰：‘本道元宽。’其善诙谐、能容人如此。当万历之末，文髓靡穆，佛经语录，尽入于文。先生以史汉大家倡之，进于六经，然后浙人翩然群思学古。忌者中公，夺官之日，诸生遮道请留。道备尊亲，学文质彬彬乎与薛方山并美矣。”^①“忌者中公”之事，即因《绿牡丹》案而起，这是明末文人党争中较为著名的一次事件。

明末文人团体复社声势浩大，许多文人都参与其中，黎元宽也不例外。《复社纪略》卷一载：“其明年戊辰，溥以覃恩选贡入京。受先联第第三，九一、八公皆告捷；江西黎左严（元宽）已冠礼闱，为主试所抑，置第二，皆社中才杰也。”^②明确提到黎元宽，并将他视为社中才杰。

黎元宽任浙江提学副使后，站在复社文人一边，处置了轰动一时的《绿牡丹》案。《复社纪略》卷二载：“乌程温育仁，首辅体仁介弟也，心丑之，著《绿牡丹》传奇诮之，杭俗好异，一时争相搬演，诸门生病之，飞书两张先生，求为洗刷，两张因亲莅浙，言之学臣黎元宽。元宽、南张同籍，声气主盟也。因禁书肆、毁刊本，桁杨书贾，究作传主名，执育仁家人下于狱。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门下者为温以介，力求解于两张先生，不许，狱竟而后归。”^③

温体仁之弟温育仁借《绿牡丹》传奇丑化复社文人，黎元宽禁书肆、毁刊本，并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显然，黎元宽因此事触怒了温体仁，旋即因文体险怪而遭罢黜。《明史》载：“体仁二子俨、伉数请嘱提学金事黎元宽。会元宽以文体险怪论黜，遂发其二子私书。思睿劾体仁纵子作奸，以元宽揭为据。体仁谓揭不出元宽手，思睿等群谋排陷。元宽上疏证明，思睿再劾体仁以‘群谋’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夺俸五月。出视河东盐政。”^④黎元宽被免官后，揭发温体仁两个儿子给自己的私信，又上疏证明。这正是黎元宽最后一次涉足政治。

黎元宽因文体险怪论黜，显然是因为政治斗争所致。他的文章在当时颇受

^① 转引自辛德勇《肃慎辛氏箋存稀见明人别集题录》（《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74-175页。）

^② 陆世仪撰：《复社纪略》，《续修四库全书》四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

^③ 陆世仪撰：《复社纪略》，《续修四库全书》四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页。介生为周钟。

^④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71页。

张溥和钱澄之等人赞誉。张溥《黎左严稿序》云：“左严持己端雅，趋翔不苟，其于正经之本，殆身安焉，不徒在其诵命辞说也。然率以为制举之文，则高矣深矣，非独下者弗习也。即时所荣竟，号为子家一流之业，左严皆远而不与，宜无所当于得志之人矣。而识者尊之，进于非常之等，此其道何出哉？论元者忽神理而尚肤泽，独左严以经术居前，而受先朴学，名亦相与兄弟。”^①对黎元宽的制举之文评价颇高，认为他的文章重经术、远子家。钱澄之《与黎博庵先生书》：“即以文，南昌黎博庵先生，仆见其文不多，友人赵国子曾一示我，其气灏灏噩噩，其言质实。其为词也，宁生毋熟，宁拙毋巧。非今之文，而古之文也。与夫世之掇汉魏之菁英而袭大家之肤革者，固有间矣。……邮其文以见示，仆读之，辞气断落，绝去蹊径，略似庄子，而实有得于昌黎韩子之学也。”^②点明他的文章风格类似韩愈，这与《进贤堂稿》序言中“盖得昌黎之神”的评价是一致的。

（二）与遗民的交游

黎元宽罢官之后，便不再踏入仕途，即使是南明政权相继在南方各地成立，也没有追随左右，而是选择归隐山野。他在《归田纪略序》中便表达了自废于世、愿为柴桑一处士的思想：“初，余与惕庵并轡皇路，未莞已别去，久之，则余乃自废于世。惕庵犹从王事，不苟避难，固其才足用也，然而持此安归乎？南方烟雾地，虽亦左徒之所求索，诸葛之所经营，适非其时，不如为柴桑一处士矣。”^③他对人生的态度也日渐悲观，《题自我作古卷子》中写道：“岁在丙午，当余年七十时，则过劫已廿有三岁矣。世事之变，靡所不经，虽进取无心，交害宜少，而退藏不密，生患亦多。感心发语，叹老伤贫之外，亦或有滥于忧天恤纬。”^④丙午是康熙五年（1666），二十三年前正是甲申国变，明朝覆灭那一年。

与黎元宽交往较密的明遗民有陈弘绪。陈弘绪是新建人，明末遭弹劾罢官，入清以后屡荐不起，移居章江，并辑录《宋遗民录》，借以表达自己的遗民之志。两人曾经共同管理澹台祠并在其中讲学，黎元宽《澹祠纪略续集序》载：

^① 张溥撰：《七录斋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2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页。

^② 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田间文集》卷五，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79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页。

^④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澹台祠为吾郡讲学地。……蔡公是征，丙申来复，益以萧坊，美而得俪。宽也不才，希当大任，乃于先时同陈君士业受公管祠付嘱，于是年复受二田。……崇祯壬午时，宽尝管会，而不及田租。……丙申时宽虽兼管会与租，而幸得奉教士业，……宽所赞襄仅三之一。”^①丙申是顺治十三年（1656），时江西巡抚蔡士英促成此事。

其他交往较多的明遗民，还有沈士柱和舒管生等人。沈士柱，字崑铜，号惕庵。沈士柱死后，黎元宽跋其《土音集》，文中哀悼痛心之情溢于言表：“崑山其颓，当不敢哭，为有嫌焉也，有亲焉也。黄天赋以奇才，无过一具，而文章之狱归之，党锢之书传之，庶顽之籍收之。网无时而不密，老杜所云世人皆欲杀，岂有幸哉。”^②而与舒管生的交往，则更多的涉及到佛学。《蘧庐外编序》载：“颇忆管生之学佛也，自六十时昉也，余与管生疑年，其学佛亦疑年。而管生六十避祝庐山，七十避祝章贡，皆过余舍。”^③

黎元宽看似归隐，其实对南明之事并不乏了解，只是在文集中表露得极少，他在《朱赤山六十寿序》中详细介绍了朱赤山在隆武和鲁王政权的经历，显露出了自己对南明政事的知晓：“赤山先生起帝室之胄，……先生遂浮沉仕途，以阅桑海。南方之帝为儻，先生无所与焉。东帝隆武差若有为，即纪年亦同，不失朱史而末弱不掉，先生于时为礼垣给事，奏草连篇，五味不食而不能强饫之诗，余固知先生之不忍读也。鲁王监国海上，余门人钱希声相之，实与先生左右。……先生间语余曰：吾生平无小得意事，稍有进取，物必败之。至于大患难三端，则往往幸而得免。三难，谓京师之甲申、江西之戊子、海岛之不知何时也。”^④

（三）与贰臣的交游

明遗民对贰臣的态度不尽一致，要视个体情况具体看待。有言论极为严苛者，对贰臣的批评往往不留情面。也有与贰臣交往较多者，如归庄，其文集中便有多篇诗文反映与钱谦益的往来。黎元宽也与贰臣往来，《进贤堂稿》中便收录了与清初江西贰臣李明睿往来的大量文章。李明睿，字太虚，以字署号，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页。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42页。

^④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晚年又号閔翁，南昌人，天启年间进士，入清后任礼部侍郎，不久因为失仪罢官。

李明睿在明末李自成攻陷陕西时建言迁都南京，但并未被采纳。这也成为清初遗民引以为恨的一件憾事，黎元宽也不例外。他在《读史馆实录小引（为李太虚师）》中写道：“自夫鸟号未遗，则燕嬉幕间，蚁斗床下，亦岂无忠言至计，排彼怀安，为大鹏之图南者？吾师乎！吾师乎！当时召对有录，副在史馆，海内外共传，无有以为此法当失者。而先皇帝亦深嘉其悃惻，膝为之前，六飞一驾，四方景从。进不难为檀渊，次不难为灵武。第云临安犹卑卑耳。夫何上有盘庚之君，而下多从康起秽之辈。异论沸腾，宸断中移，一失事机，流恨千古。是向者嬉且斗者之过也，无吊者也，夫时亦不可追也，谋亦不可废也。”

^①黎元宽在文中表达了对“燕嬉幕间，蚁斗床下”般党争的深恶痛绝，并认为李明睿的建言是“忠言至计”。

黎元宽与李明睿两人入清后共同奉佛，时常谈论如何修习佛法。李明睿信奉净土法门^②，常常指引黎元宽修习之法，《念佛征梦记》载：“閔师约为诸老念佛之会，而使宽滥焉。宽时持斋及五阅月矣。每晨起，惟焚香默称迦文十号，作礼三拜以至七拜而止，不立程限，亦欲修净土之因，未得伴侣师，此举诚宽接引导师也。”^③

黎元宽为李明睿写的多篇寿序，更是将两人在修佛方面的往来写得细致深入。《四为太虚师初度寿序》载：“于是壬寅改元，吾师年七十有八矣。……然而师昨岁诏我以无生，而又拈无量寿以相发。”^④《寿李先生八十初度序》载：“禅宗向上，某亦醉心，第依义语不得入门，先生必责某以实实下手，此其视从前提命无倦略同，而精拙盖有间矣。”^⑤《寿李閔翁师八十有五序》载：“在己酉之岁，则吾师夫子春秋高八十有五矣。……是岁也，宽谨修长斋，仅能不茹葷饮酒，非于大法有所窥见。师则为之启迷津而示净学，若曰净之与斋，其说当不河汉，乃以泛蒲之余唱，修莲社五老一会，使宽滥焉。宽甚惭，非其质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② 黎元宽《募修西山唯识庵序》表达了对净土宗的看法：“昨日，白岳语我，善友之为益也，佛法必资之，若禅宗，若净土，亦无不资之。”（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07页。）这和当时的禅净合一思想也有关系。《募诵药师经序》：“余闻净学于白岳师，且得其所挟观无量寿佛经解而读之，信乎其为实教而非权也。”（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④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⑤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也。念佛以香为度，则每炷得万声者，惟师能之。宽努力四千声而止，其率减十之六，岂非所谓瞠乎其后者哉？……师时时诏宽曰：吾于佛迹亲而神疏，迹亲而神疏，犹之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之旨。”^①

其余贰臣，如戴初士^②，《募修洞山普利禅寺缘疏》载：“其在他日，洞山尝作夜半之趋，由房头而化为民业，展转入余年友戴初士家，初士拱手还之。此其功德，盖不在布金舍宅下，余即与初士出处之致有小异同，于此事不能不为心服也。”^③黎元官认为自己与戴初士在出处的问题上尽管相同，但也心服于他舍宅为寺的行为。

（四）与僧人的交游

1. 今释澹归

黎元宽在明末曾任职浙江提学副使，对浙江学子多有祓濯之功，今释澹归便是其中之一。入清后，黎元宽奉佛，护法栖贤，澹归出世，经营丹霞，两人往来颇多。《遍行堂集》里便收录了澹归写给黎元宽的数封书信。

其中有对黎元宽护法的感服和鼓励，“今释以料理丹霞道场，未暇为一臂之助，惟吾师留神，左提右契，鼎新废院，重光祖席，即于末流有砥柱之功，不独雷峰一家私感而已”、“闻李太老欲为栖贤建大雄宝殿，已与吾师友及梅老商榷此事，幸勿放冷，盖成事固难，发心亦不易，才一过时，便鼓舞不起”。

也有对经营不易的感叹，“五年布置，去腊始得奉本师和尚入院，出家儿经营丛林，专为善知识嘉惠十方来学，亦不独一家师弟子之分宜尔也。近食指益多，担头益重，一口钵盂，有一日走，便是一日活计，未敢作息肩之想”、“今释近奉天老人，未敢为丹霞弛担，五月度岭，托钵赣、吉二府，盖是无聊至极。非不欲走谒函丈，然于二十日内，图了吉安一钵，便溯流上十八滩，结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② 《永历实录》载：“时有戴国士者，字初士，江西南昌人。中天启辛酉乡试第一。颇有文誉，善结纳为声望。解学龙巡抚江西时，降礼与交。学龙以荐黄道周被逮，国士经营其间，因以清流自标榜，驰书四方，迎送宾客，日不暇给，时称其家为东林茶馆。相传其缄书纏日用面五升。南昌陷，国士降于（清），为辰沅道兵备副使。已见江西反正，湖南恢复，陈友龙兵且压沅，遂举沅州归顺。上疏行在，自署衔云比例部院举人臣戴国士，奏称袁彭年为总宪，曹晔为枢部，臣始末视彭年、晔，宜得如二人官。知者莫不笑之，并为彭年愧。内批以硃斥其衔。彭年顾不恤物议，为之护饰，授巡抚偏沅金都御史。湖北再陷，国士复据沅州，入于（清）。自言通权变以缓明兵，为（清）保全土地人民。事觉，为（清）所杀，没其家。”（王夫之撰：《永历实录》，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69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页。

赣州之缘，九月初还山，为天老人料理六袞庆生事，掐指巡纹，奔走不迭，咫尺修阻，抑又万不得已之情也”。

还有文人之间的诗文往来，“尔时与闻大寿，拟致祝词，以空山无绢纸中缀，兹因栖贤僧便，遥寄片香。二十年离却世典，其所言者，世出世间，两种交情，一般知己，老实供通，至吾师生平盛美，未述万分之一，以付诸名公巨卿，光照史乘，不用野人阑入耳”、“会木归，得手讳，如暂侍燕笑，更读《免诗》，欣玩无已。此诗出，而世之为诗者皆可以自免矣”。^①

2. 洪浪兴渊

洪浪兴渊是安徽桐城人，出世后在江西为僧，先后居于翠岩寺、西方庵、净居寺、双岭寺。洪浪在翠岩寺时侍奉古雪和尚，后来辑和尚前后语录版行，便是请黎元宽作序。黎元宽的《为翠岩募建法堂及诸末备缘起》，记录了洪浪与自己的对话，这是两人往来的开始。后来黎元宽迎请洪浪住西方庵，凡三四年，无日不与洪浪相唱和。洪浪此后在青原净居寺受法，方以智编完《青原志略》请黎元宽作序的同时，又让洪浪固之。而后洪浪返回双岭，重建崇胜院，宣扬青原宗旨。在兴复双岭期间，黎元宽撰文迎请说戒、为其募化，《进贤堂稿》中便收录了《请洪浪大师双岭开堂说戒启》和《募兴复双岭祖庭缘起》。

3. 晦山戒显

晦山戒显在离开云居山真如寺后，住持黄梅四祖、杭州灵隐，足迹遍布四方，在经过南昌时，黎元宽便打算请他留住石亭，《云居真如寺募建大禅堂缘起》记载了这件事：“晦公昨年上疏山，过章门，憩石亭，余遂欲留住石亭，续仰山之故。”^②该文同时还记载了戒显开示黎元宽的语录：“记公所为开示余者，惟拈洞山末后一偈曰：过在寻他舌头路也，努力殷勤空里步也。”^③戒显示寂后，其弟子金襕毘堂向黎元宽诉说戒显示寂前情形。《金襕毘堂禅师语录序》载：“而晦山今年示寂，毘堂哭之哀，岂有遭他授记之痛乎？顾走语余曰：本师无逢近在云居，即日龛来，先命作一石函，置《锻炼说》数部其内，而以衲

^① 以上均录自《与黎博庵学宪（四则）》。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2-174 页。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146 册，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52 页。《进贤堂稿》卷二十八有《石亭寺募建禅堂开期结制缘起》，所载黎元宽与晦山之事相同。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146 册，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52 页。

身。此何为者，此不过示其用心之所存，正是法身边事，而其心已传于迦堂，其器已授于迦堂矣。”^①

4. 竺庵大成

黎元宽是竺庵大成的在家弟子，竺庵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逝于清康熙五年（1666），有弟子十人，在家承记莉者两人，黎元宽便是其中之一。

《寿昌寺待谥禅师竺公老和尚一仪塔铭（并序）》详细记载了竺庵与自己的往来：“宽忆逢师孤岭时，徒解文字禅耳，师进之曰：不有向上关捩子耶？于时宽深楞严，师浅之，浅之以捉贼故，其后宽锐话头，师钝之，钝之以系驴故。而宽于师，顾不揣而进规曰：人之难与言也，第卑之无甚高论。师亦许焉。师西禅嘱宽如仲尼之语，颜回曰：斋，回得使之矣。而异时师尝命宽序五大座书，宽未敢出手，是结集日也，幸不死，必遂之。”^②竺庵在禅门修习上多次提点黎元宽，也曾命黎元宽序书。

5. 同安法玺

法玺和尚是顓愚观衡法嗣，曾先后兴复龙门暇僧寺、同安寺。住龙门暇僧寺时，请黎元宽撰《龙门暇僧寺十方碑记》，记文载：“已而和尚复长虑也，物盛而衰，事势之有，走谓黎子曰：吾昔尝主云居矣，云居初不大坏，而易为整齐，是故可幸无过，以贻来贤，揆厥所自，则有洪阳张相国十方碑记文，足为明征，而定保今日子实能言其口吾龙门，子必无爱。”^③

6. 云岩睦堂

云岩睦堂，法号净莹，字元洁，别号睦堂，出世后辗转云岩、药山等处。睦堂在云岩时，两人曾书札往还、诗偈唱叶十余年，而后又有裁诗相送、作文祝寿、章门相见等事，俱见黎元宽《重兴云岩睦堂大禅师舍利塔序》：“当师隐古洞山时，余即闻师名矣，逾七年而后出世，展转乃至云岩，余所谓十余年往复唱叶者，皆在云岩。云岩之功德满千二百分，余皆有一辞之赞，且手笔记之。至庚戌而后师上药山，余裁诗以送。辛亥返云岩，师年六十，分宁人士属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54页。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317页。

余为文寿之，时维春王二月。逮孟夏，师遂有显圣之行，过章门，余才与师见面。”^①

其余与僧侶，如开先山鸣、宝峰山子、南源具准、西林犀耀、范围禅师、且庵禅师等人文交游的行迹，都或多或少能在《敕修待溢径山堂上雪峤大师塔铭》《范围禅师语录序》《且庵禅师语录序》等文中窥见一二。

和黃端伯、文德翼不同，黎元宽奉佛并不始于明末，而是在他六十岁左右，即清顺治十三年（1656）前后。具体的心理变化已经不能考见，但从他此前的经历来看，明末党争的失利、朝代的更替、南明政权的相继溃败，很难说不对他的心理产生影响。黎元宽并不严于交接，与僧人、遗民、官员甚至贰臣均有往来，但并不妨碍他对遗民之志的坚守。一旦奉佛，便推动禅门发展不遗余力。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

第三章 明遗民对江西禅门的推动

第一节 法系传承

佛门之中，重法统，重传承，师徒几代之间，往往能在断壁残垣之中，建立起焕然一新的寺庙，成为僧侶、士人、白丁辐辏之所。笑峰大然与无可大智为法门昆仲，两人同是著名僧侶觉浪道盛弟子，先后担任青原山净居寺住持。而另一声名甚大的僧侶天然函呈驻锡庐山栖贤寺、归宗寺时，有弟子石鉴今覩大力复兴寺院，弟子今释澹归多次往来江西，与士人交接，也出力甚多。这两批带有遗民身份的僧侶，成为江西清代前期佛门兴盛的标志性人物。天然函呈与今释澹归的法系传承，已在第一章展开了论述。本节即以青原山净居寺为典型代表，从明遗民在佛门师徒、兄弟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江西清前期佛门兴盛的原因。

(一) 师徒之间

净居寺在清初的繁盛，离不开倪嘉庆（笑峰大然）和方以智（药地无可）两人。两人均是觉浪道盛弟子，师徒两代与江西禅门有着莫大的联系。觉浪道盛在少年求法时，参礼寿和博山、东苑两代禅师，其后又住寿昌福船、庐山圆通等处，大然住持净居和药地禅游江西，均与他有关。

顺治十四年（1657）春，笑峰大然至青原山扫塔，恰逢吉州檀护欲迎请道盛住持青原，大然于是被留在西峰修夏。当年秋，吉州檀护请大然代座，而道盛已赴杭州皋亭，遂委请大然主席，大然这才开始了在青原的住持生涯。

从大然的行迹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始终都在追随着道盛。道盛从栖霞转天界，命大然代座栖霞；从天界至博山，又命大然代座天界；从博山入梦笔，命其代座博山。大然先代座青原，而后身任住持，便是因吉州檀护委请道盛，而道盛不至。正像他在代座时所说：“今吉州诸檀护延请本师主法青原，师尚未至，而请然先代座，则不惟代终，且代始矣。”^①

^①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7 页。

顺治十六年（1659）冬，道盛去世，大然曳杖南奔，次年三月至天界，四月趺坐而逝。在离开青原时，他题道盛画像曰：“青原原请你住，不合令我充数。因你两年不来，并我一时牵去。”^①大然离开青原，也是因为觉浪道盛的缘故。

药地无可与其师的往来，更能体现出法系传承对江西禅门的影响。药地无可礼觉浪道盛为师，是在顺治十年（1653），躲避清朝官员逼迫其出仕而为之。药地入江西登五老峰时，觉浪道盛寄书信给他，期待他振兴曹洞宗风。《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二七《寄示无可智公》载：“（佛教已失其真），此杖人隐忍，的有不容自己者也。你智子于此，又何敢自委乎？彼卧薪尝胆、破釜沉舟为何事？而吾宗正丁此时，如不能于此门创开不测之门，无毒拈出不传之毒，则又何足使此能作向上主盟，别展逆流手眼乎？闻子已出龙眠，隐于匡庐，当以破兰一茎，慎自变化之。”^②药地无可可在江西禅游期间，遍历景云寺、资圣寺、寿昌寺、廩山寺、南谷寺、疏山寺等梵刹，最终于康熙三年（1664）驻锡青原山净居寺。

至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初七日，觉浪道盛逝于天界寺。方以智作《善世门哀辞》，有“中宵滴滴枕头泪，世出世间皆不知”之句。又在次年作《天界老和尚周忌拈香》，有“自从刀头撞倒太平拦路锥，十年并作一年啼”之句。哀痛之情可想而知。

经大然和药地两人的大力经营，净居寺秉持曹洞宗风，申君臣五位之旨，正是师徒法系传承的结果。

（二）同门之间

师传而外，同门兄弟之谊又是促成禅门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笑峰大然和药地无可便是典型代表。大然和药地之父方孔炤在明亡前便已相识，方孔炤《寄怀笑峰大师西江》中载两人共居囚室之事：“忆昔剑头炊，把臂在西库。永夜

^①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7 页。

^②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十二《破篮茎草颂》载：“今年，倚杖天界无可智公从生死危难中来饭命于予，受大法戒，乃掩关高座，深求少林服毒得髓之宗，披吾参同灯热之旨，喜其能隐忍坚利，真足大吾好山之脉。予时归博山武夷扫二先师之塔，特潜为别予，因嘱之曰：‘圣人无梦不能神，大海无波不生宝，使圣凡无怨艾之毒，则皆无出身之机也。子当以大法自命，痛此悬丝，宁不自憤乎？’智曰：‘不肖何人？且在鬼门关上卖破蓝耳。’予笑曰：‘此非吾家毒草能出入乎，正好打死蛇吞活龙，以大阐提行无间行作常不轻起，吾三堕之，密不负此一蓦札乎？’因更为破蓝茎草颂以识之。”

铁锒铛，枕险不忧惧。”^①大然也有《怀仁值方中丞》。方孔炤逝世，药地在合山庐墓守丧，大然作《柬无可合山墓庐二首》。其后，大然七十生辰时，药地作《自寿昌寄上青原笑和上》，同时奉上《鼎薪》《易图》祝寿。两人的往来也涉及到禅、易等学问的交流，药地在《致青原笑和上》中即详细阐述了庐墓期间研究教乘、易学所得，又在最后写道：“读大师示，曷胜拊髀。舍第二、第三句，无第一句，何阙现春秋，身虽无作受报，亦不忘维摩提此命如响矣。夺西震东，类辩包荒，乃本具代错之几者也。老人双选托孤，正是护大道之苦心，而捷于用其灵药，但时倡之，自有应者。世间人敬德爱才，偏贵相左，昵庸好奇，只取其便，可困炼并收。使其发挥旁播，徒推拒之、锢限之乎？青原传心堂与白鹿同，东廓、念庵本从此入，青螺、南皋皆知回互。近日理家惟贵挈瓶，先以《天界纪闻》投之，使知正大，然后可薰鼓也。才人则以《提庄》投之，姜枣何能逃哉！”^②由大然的开示法语，至觉浪道盛的儒佛双选、庄子托孤之说，再到青原道场的儒佛共盛，可见两人往来书信谈论之深。

大然于天界逝世后，药地即设灵炷香，说道：“半生倪夫子，七载白云库。劫火入杖门，栖霞只一步。朴庵、遁斋改笑峰，不觉一笑天地通。熄邪之雷不可少，救东震西一茎草。青原鋤斧破虚空，笑趁蒲鞋一齐扫。竹关三载感雪恩，溅血迸碎玄黄门。今日香炉，安得不倒地？倒此灰堆如何？出气，啐！”^③对大然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与大然、药地共同嗣法于觉浪道盛，而均驻锡江西的，有竺庵大成、其天大浩等人。竺庵大成^④曾修复并住持寿昌寺，与大然和药地均有往来。曾作《青原访笑和尚步山谷韵》，大然和诗《送竺上人次其韵》。又有《喜和药地法兄韵》：“超出人天第一方，未生前信此灵长。倒来莫怪天翻地，立定何愁雪后霜。药采核仁原有种，花开庭树早知春。寿昌喜和枯荆韵，一笑临风吐电光。”^⑤竺庵逝后，讣至青原，药地上堂说道：“痛绝！痛绝！竺庵和尚和盘倒却去也！两点眼珠，一场滴冻，有分痛者触着，便可瓦解冰消。若犹一膜依稀，莫嫌今日叨怛。念我杖人一碗礮沙，被竺法兄打头吸尽，所以径山拼命见贼，攒刃生

^①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②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③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首三，华夏出版社2014版，第75页。

^④ 生平语录见《五灯全书》卷一一七。

^⑤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莲。”^①其中的痛悼之情和对竺庵的钦敬之情不难想见。康熙六年（1667），药地往福建途中逗留新城，扫廩山忠祖塔，便是因为竺庵约其共上鼓山同礼东苑，未成行而竺庵已示寂，遗书言传灯事，药地有感于此。此举更可见两人与法系传承间的交往关系。《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四所载《竺和尚讣至设供》：“骨肉虽同门，一生不相识。方期南浦会，撞倒海波泣。”表明两人未曾识面，相约会面，然终不得见。

其天大浩禅师^②，虔州信丰杨氏子，二十四岁时依天界得法，示寂于康熙三年（1664），塔于寿昌。《冬灰录》卷首有《寿昌其天和尚讣至设供》，载药地设供之语。

觉浪道盛及其弟子笑峰大然、无可大智、竺庵大成、其天大浩等人，在师傅与同门之间的法系传承，不仅促成了青原山净居寺和新城寿昌寺的兴盛，加强了两地两寺之间的沟通，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使得清前期江西曹洞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节 寺院修建

寺院是禅门僧徒修习弘法之所，殿阁的完备、规模的弘大，是禅门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明末的寺院修建，呈现出守成的状态，较大的修建工程在明中后期便已经完成，故本节论述的寺院修建，将着眼于清初的一段时间里。朝代的变革，为寺院建置带来了破坏，也因此引发了一次修建的高潮。举凡江西著名的禅宗名刹，如庐山的圆通、归宗、栖贤诸寺，云居山的真如寺，青原山的净居寺，均在这一时期鼎建殿阁，明遗民则在修建的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其余寺院，即使不甚著名，也不难发现明遗民在其中的推动作用。^③

（一）修建目的

^①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三，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② 生平见《五灯全书》卷一一八《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随录》。

^③ 如南昌浴室寺，明遗民陈弘绪《江城名迹记》卷三“浴室寺”条载：“在永宁寺东，相传马祖创建，盖沐浴之所也。戊巳变后，予入郭，首过其处，见荒葛满途，不胜纷浊之感，作《江城怀古》六十首，遂以兹寺为冠。予友黎左严学使既成和章，复作募疏重新之。僧逢祖凿小池，种花环绕，额曰‘醉花池’。一时名流俱有题咏。”（陈弘绪等撰，段晓华点校：《江城名迹记·江城名迹记续补三种》卷三，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1页。）

黎元宽称自己多制募疏文字，而且是无问大小，呼而必应。以至名声在外，被视为善作募词，因此常常有僧人请他作募序、缘起等文字。他热衷护法寺庙所秉持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筑广厦，来禅人。《云居真如寺募建大禅堂缘起》载：“今欲奏锻炼诸方之功，而置炉运口之无地，则非所以来禅人之道耳。且诗人亦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若夫天下之禅者多矣，使其有一人焉，至而不得所归，归而不得所息，则岂止于寒颜之不庇？”^①欲锻炼诸方，则需寺院道场为依托，才能汇集僧侶。

二是好其地，友其僧。《募重修云峰古寺序》：“西山户牖间物，而余直宾之而未主之，岂欲以不登成其不下也哉。然每津津焉，如蓬莱阆苑，古仙之奥区，人鲜有褰裳濡足者。哦诗作语，乃信耳及之，又如乐国往生，阿閦一见，心焉游之，即身焉至之矣。是故余亦耳西山而心西山，不必其主西山也。”^②喜好山中的自然风光，和僧人游览其中，这与文人的审美情趣相契合。

三是存读书，奉大禅。《大修庐山开先寺缘起（首题读书种子）》：“他日雪峤和尚主于开先，则黄海岸致之，海岸复从而营十笏斋以居之，非此意耶？今山鸣公之大禅，固雪峤和尚真子，而余读书逊海岸，遂不能为山鸣别立十笏斋。……盖余多言檀而未尝不及禅，犹之余多言世事而未尝不及读书，今存开先即以存读书，且得奉大禅如山鸣公，所谓一物而三善备，余有志焉。”^③礼请大德高僧住持，使道场的独特传统不致断绝。

其他明遗民，无论是身为僧侶还是居士，大都秉持着以上的一些目的，投身于禅门寺院的修建和兴复之中。

（二）修建行为

明清之际江西禅门兴衰概况，可以通过某些寺院的具体发展看出端倪。圆通寺即是一例，文德翼《庐山圆通寺僧户碑记》载：“崇祯间，建武黄元公延浪杖人是寺登坛说法，法倡云奔，适旻师塔圮，留识重开，元公属先君子治其事，先君子卜甲戌秋吉鸠工告成，洗祝镌石，时日并符，元公喜甚。日与坐夜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二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01页。

话庭中，商略性学，然先君子留意濂溪通复之蕴，而元公先生欲以山谷强茂叔就锻炼于宿老，各相视而笑也。自浪杖人移锡他去，先君子既陨谢敷之星，而元公先生又含卞壶之石。圆通二十五圣之地，方且鞠为茂草一丈矣。兵后十年，渐得苏息，一时名卿钜公，轺车至止，必为之悯惜，召残僧询佚事、理寺产、复释户，僧始得旧田而耕食之，并以食方之来者。”^①庐山圆通寺因人而兴，崇祯年间有黄端伯、文士弘和觉浪道盛三人加意护持，寺院鼎盛。三人离去之后，加之战乱兵祸，渐成废墟。至时代稍稍太平，“名卿钜公”又纷纷来此，“询佚事、理寺产、复释户”，圆通寺得以复兴。

在江西，复兴的寺院当然不止圆通寺一座，而且形成了迅速发展的态势，部分明遗民的文章中便反映了这一点。康熙十二年（1673），谢文淳登云居山，见到经过晦山戒显和其徒燕雷元鹏修建一新的真如寺，不禁感叹道：“予前自五老别日公，冒雪谒鹿洞，见其室庐荒陋，阶前遍榛莽，庭户阒然，整敝衣冠，向墀道瞻拜，三叹而出，徘徊古松石间，哽咽不得出一语。今睹云居之盛如此，予能不悲吾道之衰也？岂世无颛愚、晦山、燕雷其人耶？抑时但当出世，故释盛而儒衰耶？予又不能不恸哭矣。”^②白鹿洞书院的荒凉景象，与真如寺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文淳从一位秉持儒家正统的文人角度出发，不得不哀悼儒道的衰微。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宋之盛身上，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过善山寺时，见梵刹庄严，忆起曾游白鹿洞，其地亭台荒颓、廊垣草莱，不禁感叹道：“阖郡邑大小吏，上下庠衿绅，何莫非孔门儿孙，而秦越肥瘠视之乃若此！至各名山梵刹，百宝庄严，则又半大小吏、上下庠衿绅之所不吝予而取诸怀者也。宗周莫卹，出戍申甫，惑滋甚矣。”^③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大小吏、上下庠衿绅。

遗民为僧者一旦住持寺院，自然要以兴修道场、鼎新建置为责，这也就成为了他们为佛门所做的一大贡献。笑峰大然在《募修净居禅寺疏》中描写了初至青原所见的情景：“七祖塔额重新，塔院岿然，殿堂翼然。而一阁架空，号曰毗卢，则骨立于风吹日炙、阴雨晴岚之中者，垂五十年未之装也。主阁未成，

^①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② 《建昌县重建真如寺殿堂记》。（谢文淳撰：《程文山集》卷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0页。）

^③ 宋惕撰：《髻山文钞》卷上，《豫章丛书》集部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0页。

堂寝不具。旧志所载钟鼓二楼、曼殊、准提等阁及善法、观心、原梦耆旧，客堂、寝堂、丈室，雷泉、龙穴、徘徊、洗耳等亭，归云、蒼蘭等轩，则又鞠为茂草矣。”^①当时所存建置，较旧志记载仅存十分之五，尤其是毗卢阁破败不堪。青原毗卢阁的修建，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但中途作罢，直至笑峰大然住持时，才完成修建，施闰章在《青原毗卢阁碑记》中记载修建过程：“公（笔者注：指笑峰大然）谓是阁岿然为寺冠，即不成，如祖庭何？吾当了此归天界耳。又当豫章穷瘠，适靖南藩府布千金，鸠匠石。一时野樵田父，踊跃奔赴，雷动山涌，功逸而事举。”^②方以智则新建祖堂、归云阁等，进一步完善了道场的建置。

戒显初住云居时，在《募建云居大殿疏》里描绘寺院破败：“第自诸缘老宿奉神庙敕建以来，岁月浸久，屋宇渐倾。昔年缔造，虽系鉅材，山顶高寒，全殊平地。冰霜严于剑戟、风雾烈于雷霆。以致佛殿僧寮，咸忧圮坼；斋堂庖湦，悉虑踰摧。且以锦绣琅函，颁自御府；铁瓦藏殿，冠乎西江。椽因差脱而星疏，经渐淋漓而腐败。其余从屋以逮重楼，四时雨灌，则室内成河；万壑雪飞，则床头积缟。峥嵘祖席，致殆龙象之悲；奇突名蓝，隐切荆榛之患。”^③一片凋零景象。在住持的几年时间里，他相继于顺治十年（1653）重新修建了大雄殿，于顺治十三年（1656）增置供应堂、香积厨，于顺治十五年（1658）建云农寮等处。

今释澹归感叹自己为僧之后，多行穿州撞府、募化求缘之事。或为养僧供众，或为函呈料理庆生事，或为寺院改造，他四处募化。江西是澹归经常来到的一处地方，相关记载多见于他与汪汉翀、金公绚、刘焕之、陆孝山等人的通信。^④虽然澹归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丹霞山别传寺的营建，但对江西寺庙的兴复也

^①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1 页。

^②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2 页。

^③ 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版，第 304-305 页。

^④ 这些记载如：“涉春想起居胜常，弟亦穷健，更溯凌江，度庾岭，且向江西人化糯米糍粑供众”（《与汪汉翀水部（六则）》），“弟今年五十五，劳苦稍久。昨岁多病，觉精神顿衰，此时更走南雄，托钵欲出江西，拟九月还山，未知因缘何似”（《与公绚兄（十则）》），“庐陵之行，幸不擎空钵以归，顷还岭头，为老人料理庆生事”（《与刘焕之副戎（十五则）》），“此间田价所收，常住与修造借支不少，原拟江右之缘补之，今如此急迫，岂不可恼”（《与南雄陆太守孝山（四十八则）》）。分别见于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9、194、204、220-221 页。

有贡献，比如赣州光孝寺，《与胡雠藩明府（二则）》载：“赣州光孝寺，古道场也，三世诸佛、十八尊者，皆唐塑奇古。东坡过此，有《廉泉诗》。乱后梵宇颓塌，弟往岁见而伤之，留数门人，令之经营修复。此地为闽广往来之冲，既以兴隆三宝，又足接待十方，亦福田胜区也。石语监院盖实地修行之士，支拄四年，颇着劳绩。兹以营建，钱粮不敷，持一钵走贵治，乞诸善信，敢为先容于左右。知廉橐无余，非弟杖履所经，亦乐观其成就，皆吾兄荣施也。祷切祷切！”^①这是澹归为光孝寺监院石语外出募化，而写给当地官员的书信，信中还提到了澹归见光孝寺梵宇颓塌，而令门人经营修复的事，可见澹归对于光孝寺的修复，不仅是襄助而已，实有主导之功。

对于远在庐山振兴栖贤寺的法门昆仲，特别是石鉴今覩禅师，澹归也会提供大力的帮助，在他与黎元宽的四则尺牍中，便有嘱托黎元宽护法栖贤的内容：

得栖贤信，知吾师于荒刹残僧，护持不遗余力，感服无已。近时佛法陵替，付嘱全在王臣，然“护法”二字，只是随俗通称耳，若不识法，护个什么？往往辅魔君而摧净业，慧日永沉，迷途失导，皆以善因招恶果者，自非于大般若中熏习甚深，眼明手辣，护法担子岂易承当？此今释于吾师所为，有千里同风之叹也。石鉴覩禅师，英迈逸格之人，雷峰真子，宿具弘愿，振兴祖庭，携铜头铁额之侍，为刀耕火种之事，舜老夫、辩首座先后一揆，期当在此。今释以料理丹霞道场，未暇为一臂之助，惟吾师留神，左提右契，鼎新废院，重光祖席，即于末流有砥柱之功，不独雷峰一家私感而已。

栖贤道场承吾翁护持，不遗余力，盖非世间交情可比，每与同流言及，感叹不置；中间修候阔疏，亦只是被丹霞驱策，殆无一日暇耳。……石鉴在彼，甚荷提携，有便寄渠一语，贵知老人已入丹霞，甚安乐也。

闻李太老欲为栖贤建大雄宝殿，已与吾师友及梅老商榷此事，幸勿放冷，盖成事固难，发心亦不易，才一过时，便鼓舞不起。西堂若到，

^① 《与胡雠藩明府（二则）》。（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7-258 页。）澹归有《古光孝寺》：“古寺斜垣一带收，城隈野色望中稠。我来避暑当深夏，殿角惊寒欲送秋。飞锡无声先憩鹤，（右上为万寿宫。）毁巢有客尚鸣鸠。（昆庐阁欲坏，亦为兵子所据。）廉泉贪地谁能辨，为语西江更择流。（廉泉故寺，地今割为书院。）”和《示石语还赣州光孝寺》：“祇林一诺未容寒，风雨遥怜过急滩。片石即看成砥柱，错将平地作波澜。”分别见于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三），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6、242 页。）

幸留神从叟二老，大家作勇猛欢喜之幢。^①

以上的三则尺牍中，澹归在第一则中感叹护法不易承当，赞黎元宽识法而护法，又介绍同门石鉴情形，期望黎元宽能重兴祖庭。第二则中向黎元宽倾诉经营丹霞不易，又托他寄语石鉴。第三则中言及李明睿发心为栖贤建大雄宝殿之事，希望一鼓作气，勿要放冷。

在给江西另一位遗民陈弘绪的书信里，澹归也托其与黎元宽等贵乡同志共作转轮功德，共同护法栖贤，同时他也极力赞扬石鉴今覩：“石鉴大师受雷峰付嘱，出理此刹，欲起废院而一新之，皆是菩萨行愿，读其所辑栖贤诗文，真足以挽颓流而励末俗，与今之裨贩如来者远矣。此老文章品节，向于岭表，国士无双，近入法门，一鎧便就，盖再来人也。居士英灵汉子，冠绝时贤，于最上乘植根已久，想当有握手倾倒之乐。”^②

明遗民对禅门寺院的修建行为，在上述材料中得到了大致的呈现。位于九江的栖贤寺、真如寺，位于吉安的净居寺，位于赣州的光孝寺，分别为石鉴今覩、晦山戒显、笑峰大然、今释澹归所修复，他们同是遗民者，为僧后又积极投身禅门事务，对江西禅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节 文学创作

游览山川胜景，并形之于诗文，是文学史上一直以来的传统。自然景色的清静幽深，又使士大夫与僧侣在审美情趣上找到契合点，这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明清之际这一特定时期，士人们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剩人”“遗世”的消极心理，对明遗民的好游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他们愈发喜爱游览山水，走近自然。遗民的同游者中不乏僧侣，遗民为僧者也常邀各类人物流连山水之中，这一现象，拓宽了士僧交游的内容。像文德翼和方以智、晦山戒显等人便是江西禅门中的代表。

（一）心态表现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714页。

^② 《与陈士业文学》。（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03页。）

文德翼好游，这在他与钱澄之、方以智和晦山戒显等人的交游文字中不难看出。黄端伯《文用昭集序》云：“浔阳文用昭，家在庐山之麓，长江九派收之襟带间，游宦越中，风流日甚，舟车所至，必载四方之山水以行，过则游，游则记，传神布景，逸兴遄飞，即杂之《禹贡》《山海经》、太史公《传》，几不辨其为一人为二人矣。”^①便写明了文德翼性好山水，在明末宦游浙江期间就是如此，这和入清后的好游是一以贯之的。

他所做《戊戌游庐山记》《游麻姑山记》《游从姑山记》等文，便详细记载了自己游览山水的经历，其中多是与僧侣的交接，比如《戊戌游庐山记》：“至栖贤，天然师已反五羊，僧即觉雅倩共对紫霄时，五老拥被自障，疑客欲图其形也。”“至亭望彭蠡一杯耳，僧玉明，高邮苦行者，具茗殊恭。”“卒止火莲院，院新口僧竹浪解衲衲解履履，余三人是夕宿院中。”“曳杖到桥，揖宝树而过之，时大林天岳师已放锡，故过而不入。”“涉涧，扣东林净业堂，不启，曰：老僧适城濯足已。他僧迎晚食，方布榻，而真公持火款门曰：知客到也。”^②《游麻姑山记》：“丁未孟夏，甲子抵吁，越翼日乙丑，谒苗南城九符，苗曰：墨历禅师住锡景云，公幸少留。……丁卯霁，苗报徐仲光来矣，散步往寻仲光，正供墨师午斋，座上客满。南丰汤恪素（年伯）、广昌何观我、新城杨东曦、峡江曾公子在焉。其一南城邓幼立也，皆惊视相笑。有三十年相思者，有二十年相别者，遂订游姑山。”“昔者，师以青原小三叠泉诗见属，至是指桥示余曰：大似三峡。余笑曰：小三峡耳。师亦大笑。”“同饭慈慧庵中，长枫瘦竹，共带斜阳，师息塔院，四人板榻互对，大似兄弟，连床听雨，乐可知也。”^③《游从姑山记》：“是月也，癸酉，仲光复作从姑主人。墨历师乘观我扁舟相俟。恪素先生余勇且贾，魏平仲、傅用兹二进士继至。”^④

山水中的禅理乐趣，自然也成为了与僧人交往的内容。《送庐山匡云适南州序》载：“余一度上山，辄一度与之谈，指泉为甘浆，指云为玉糁，指石为荔子，曰：某之供养居士侈矣。”^⑤用泉、云、石为供养，以区别于世俗的甘浆、

^① 黄端伯撰：《瑤光阁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23页。

^②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72页。

^③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77页。

^④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页。

^⑤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441页。

玉糁、荔枝，僧人的淡泊心态，极易与明遗民们形成共鸣。

（二）作品迭出

方以智住持青原后，便游遍了青原山周边，作《青原山水约记》《青又记》《游永和记》《青原得瀑记》，《青原得瀑记》记载方以智询问里人发现青原山天玉山瀑布后，刘润山、吴六益、张逢伯、吴舫翁、郭入洞相继乘兴前往，吴六益作《同无可大师、润山、逢伯、石墅、舫翁登天玉山观瀑布》《仰山峭石听逢伯吹箫》等诗，刘润山作《天玉山瀑布和韵》，张逢伯作《游青原和六益韵》《和玉山瀑布韵》，吴舫翁作《观天玉山瀑布》，郭入洞作《观瀑布作》。而后吴季六又发现新瀑一处，便吸引了施闰章、沈治先、杨商贤、温玉山、徐伯调、吴舫翁、季六、郭入洞、丘贞臣、林祖涵同游，施闰章作《寻青原山中新得飞瀑，目之曰小三叠，率题短句于青又庵之壁》，沈治先作《游小三叠（药地大师新开）》，杨商贤作《游青原瀑布泉记》，徐伯调作《青原山新瀑布歌呈药地大师》。青原多了一处景观，自然引得多人游览，并记之以诗文。

晦山戒显作集景诗，咏云居山各处风景古迹，有《明月湖》《五龙潭》《赵州关》《佛印桥》《石鼓峰》《钵盂峰》《罗汉塔》《云顶田》《莲花城》《罗汉墙》《神宗御笔》《复合神钟》，又有《答太仓顾麟士寄诗》《咏云居（二首）》《登云居五老峰绝顶》等诗，描写了云居山的风光禅韵。

山水田园诗歌，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类型。通过此类作品，遗民和遗民僧侣们不仅寄托了对山水胜景的钟爱之情，也将禅理熔铸其中，而遗民心态里遗于世、遗于世的部分，也在不经意间有所流露。以此带动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因为关于诸多僧侣，也侧面体现出江西禅门的繁盛。

第四节 山志编修

佛教山志（寺志），作为详细记录一寺周边山水、法系沿革、佛刹殿阁和题咏诗文等等的志书，它的编成不得不在寺院诸事齐备之后，住持僧侣的大力倡导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一部山志（寺志）是寺院发展到鼎盛时的产物，而山志（寺志）编成后的流通与传播，又继续维持着寺院的兴盛。徐芳《寿昌志略序》就写到两者关系：“是编存，而天下之欲见寿昌者，迹其

山川，如掘其幽峻；披其图宇，如历其崇深；验其提唱，如耳其幻眇之音；徵其设施，如目其纵横之用。浅深之间，皆必有助也。”^①阐明了《寿昌志略》对于寿昌寺的积极意义，其他寺院亦是如此。

（一）参与主导

明清时期编著并流传下来的佛教山志（寺志），大约只有五种，分别是《归宗寺志》《青原志略》《崇恩志略》《云居山志》《秀峰寺志》，其中《青原志略》和《云居山志》的辑著都由遗民为僧者主导，又以《青原志略》更为著名。《青原志略》自出心裁，将“书院”设为专门一卷，虽然被四库馆臣讥讽为“援儒入墨”，是“自张其教”之举，但客观反映了青原山自明中期以后“荆杏双修”的传统。同时，该志还保存了大量方以智晚年所作诗文，成为现代学者研究方以智必需的文献。而《云居山志》则胜在法系的完备上，共记录该寺四十八代住持。两部山志的编成及其优长之处，均得益于住持两寺的遗民为僧者。

《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青原志略》为大然撰、施闰章补辑，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今人经过研究，将方以智也列入编撰者中，经过粗略估算后认为“笑峰初稿当不超出六万言，方以智新增者则有十万字左右”^②。明遗民直接参与编辑该书的材料，应当不出以下三条。

一是该书《发凡》最后的识语，识语标明“浮庐愚者识”，内容为：“青原志稿为久昌、芝颖所编，就净居柱壁存者耳。施少参持去订正，付伯玑谋梓，未得卒业，复还青原。施公意收山之四周，惜此方文献缺略，征考为难。年来游屐已遍，托人采获，幸收一簏，姑作《发凡》，令从游能笔者序录焉。”^③“浮庐愚者”即方以智，他游遍青原四周，托人采获相关文献，并写作《发凡》。二是书前的几篇序言，序言大致写明笑峰大然始编山志，其徒增辑之后，交于施闰章删订，施闰章并未删订完成，又转交回青原，由方以智最终编撰成书。三是每卷标题下记载的编辑者与校订者。像卷一《山水道场》由青原山笑峰大然编稿，卷六《游记》由青原山大然笑峰辑、豫章陈允衡伯玑订，卷九、十、

^① 徐芳撰：《悬榻编》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② 详细论述见张永义《〈青原志略〉成书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92-96页。

^③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3辑第14册，台湾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45页。

十一《诗》由豫章陈允衡伯玑甫订。

另一本较为重要的佛教山志《云居山志》，虽然最终成于晦山弟子燕雷元鹏之手，但数代住持都参与其事，晦山戒显出力尤多。袁懋芹便在《与云居燕雷大师》中记叙了晦山戒显为修志所做的一些准备：“稽传灯而清道统，考方舆而正山源。”^①明遗民熊维典也在序中写道：“《云居山志》，颛愚师尝欲为之，已移紫竹林，弗果。晦山师又欲为之，已移四祖，又弗果。今燕雷师卓锡是山，始克为之。”^②晦山戒显自己则在序中写道：“余从辛卯忝主斯席，烟蓑雨笠，敲击衲子之暇，时愤愤以编志为事。既得艾志载欧峰山川名人题咏颇悉，并搜讨宗书世典，几成集矣。会经营建殿，苦无宁晷，兼草《云居赋》成，薄刻流通，遂尔停搁。辛丑再图从事，遂移笠双峰，近复继往灵隐矣。”^③同时，他也写了建昌县本地遗民熊维典参与编写的过程：“约翁苦行柴桑，综内外典，虑云居祖迹，或致湮沉，不惜焚膏与鹏子汇成大帙。”^④

燕雷元鹏编《云居山志》，完成山形、道源、建置、兴废等条，独艺文一则，尚需补充，袁懋芹建议道：“若本郡邑之缙绅先生，无论矣。如浔阳之文用昭，承明著作之才。星渚之宋未有，大儒理学之宗。俱曾久驻云居，必多发之吟咏。用翁之文，熊约翁必有记录。未翁现设教于淦姓，皆可访而致也。此中学诗之人不乏，能诗之家甚少，以弟所推击者，有杜虎子之逸迈，熊木升兄弟之博雅，吴叔吉之淳朴，邹成初之清警。置之三唐，可当一面。可曾得其游山佳什几许？”^⑤这其中提到的文德翼、宋之盛、熊维典等人，都是当地的遗民，山志中部分诗文的汇集，有赖于他们提供的材料。

不难看出，卷三《住持》、卷四《过化》、卷十四《题咏诗》、卷十五《题咏诗》的部分内容肯定由晦山戒显辑出，而他所做《天上云居赋》，已经记载了云居山的山水、殿阁、寺记、僧侶，表明他虽然未完成山志，但山志的编辑在此时已经初具规模。《云居山志》的编成，离不开明遗民晦山戒显和熊维典的主导与参与。

山志（寺志）的编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座寺庙的兴盛程度。康熙三

^① 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26页。

^② 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89-190页。

^③ 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91页。

^④ 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91页。

^⑤ 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26-327页。

年（1664），今无、今覩集前人游览栖贤寺的记载和天然函昱山居时所作诗文，编为《栖贤诗文汇集》，诗文汇集虽然不等同于山志（寺志），但山志（寺志）的大部分卷帙都是诗文，学者研究山志（寺志），也会格外关注志书中收录的文学文献，便是由于其中名人大家的诗文具有较高的辑佚和校勘价值。澹归作《书栖贤诗文汇集后》：“《栖贤诗文汇集》刻成，某不觉合掌赞叹，石鉴大师得道多助，不似我丹霞山冷冷落落，无古可攀，无今可倚。”^①歆羨之情不言而喻，也不难看出栖贤寺当时的兴盛景象。

（二）作序阐释

书前有序，是一直以来的惯例，佛教山志也不例外。黎元宽的文集《进贤堂稿》中便有几篇为山志（寺志）所作的序文，且各有特色。

有记叙几代僧侶经营道场的，如《灵峰寺志略序》：“前乎此者六十年，江西之禅，莫高于大通和尚矣。……一时名噪甚，江国之王公大人以及四众迎请而主龙光，其教之所被，亦殆于法周沙界者矣。未几何也，乃营住静西山，得灵峰寺，止之不欲去。……而事专以属大弟子法真。……盖自丙辰至庚申，五年而即工。而大通即以是年示寂，塔于峰巅，明乎其始终相依而不相离矣。其旁近有香城者，灵峰之别峰也，大通复尝属第二座法海起之。……而其徒孙本同隐庵者，再起之，以视不立。既加厉增华，又能标十景之目以来名题，著志略之书以传不朽，而并使余为滥吹。”^②详细叙述了大通和尚及其弟子法真、法海营建西山灵峰寺和香城寺，再传弟子本同隐庵踵事增华的事迹。

有简述僧侶生平和编撰山志过程的，如《宝峰山志序》：“初，山子和尚有事宝峰，余为举马祖建立法界真如之语。……将从来住山诸祖，重宣五色之光；令海内参访名流，莫泥十成之句。遂增损旧志，著为一书。上续心灯，广包轮藏，人之所疑为大且迂者，山子固得之于卷舒间矣。夫山子为弘觉国师大弟子，……方其自普贤而上宝峰，两志俱作，在已精益求精之日。未几而再主西峰，为其旧地。又未几而仍主宝峰。”^③宝峰山子和尚的嗣法情况、住持经历

^① 澄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一），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448页。栖贤舍利事，在丁未浴佛日，见《送石鉴覩兄奉命之长庆》。

^②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5页。

^③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进贤堂稿》卷二十六有《宝峰募疏》。

和修志之举，通过此文得以保存和展现。

有阐明僧侶对于寺院意义的，如《青原志略序》：“药老人于是高座中五，据令当阳，而别创归云之阁以安禅观，构药树之堂以救生死。于公慧男更作晚对之轩于翠屏之下，以与老人畅谈谐而析疑义。则夫钓台、青又，及而出王，待月、迎风，时勤履迹，盖不必侈言空诸所有也，而其大指，尤归重于儒佛之通。杖人翁言：‘世尊尧孔，并有托孤，此意在人，亦在山水。’青原于天下遂为儒佛辐辏之区。”^①药地无可经营道场，以儒佛之通为大旨，使青原成为儒佛辐辏之区。

成书于明清之际的江西禅门山志（寺志），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有《青原志略》《崇恩志略》，以钞本形式流传下来的有《云居山志》，除此之外，从明遗民文集能考证出书名的，还有《寿昌志略》《灵峰志略》《宝峰山志》诸书，这又是江西禅门兴盛的又一明证。明遗民在山志（寺志）的成书过程中，主导、参与、作序，体现着弘扬禅门道场历史与文化的态度。

第五节 思想交融

不论是遗民逃禅，还是遗民与僧侶交游往来，最终都会发生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尤其在江西，自宋明以来，理学与心学特盛，细考明清之际的江西禅门，儒家与禅宗的交流过程中，出现了截然不同、乃至复杂的趋势。一种自然是接纳，遗民文人不以儒释二者为界限，极大地推动了禅门思想的活跃。另一种则是抵牾，遗民学者对禅门僧侶和禅门思想加以挞伐，以此表明自身的儒家立场。

（一）接纳圆融

由于时代的原因，遗民们在与禅门僧侶的交往中，常常对秉持遗民精神的僧侶表达欣赏和敬佩，体现的正是一种接纳的态度。当谢文淳游九江时，听闻了颢愚观衡三月十九日^②举声恸哭、晦山戒显国变后削发为僧的行为，不禁心生感慨，他在《建昌县重建真如寺殿堂记》中写道：“一夕，日公偶举颢愚和尚于江南紫竹林，三月十九日荐国忌，和尚服缞绖焚香，举声大恸。观众万余俱

^① 黎元宽撰：《进贤堂稿》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② 明崇祯帝自尽于三月十九日。

感，哭声撼天地。予闻之悚然心震动。恨生平不识颟愚状貌，当其哭时，不得身与其间，以自感发增益为疚。继而过修江，谒熊约生先生诸令子，述晦山和尚初为名诸生，闻思庙殉社稷，趋文庙痛哭，负所作文及青衿，拜告焚之。去祝发为僧。予复悚然不能忍，如前闻颟愚事时，又自恨坐老岩壑，不但佳山水不得入目，有血性男子如此，皆先予死，不得相对一抒胸中所郁积。呜呼！何吾生之不幸也。”^①将僧人称为“血性男子”，便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遗民精神，谢文淳的身份认同感，使得他欲与颟愚观衡和晦山戒显抒发胸中郁积，只是最终未能得见。

同样有此遗憾的还有汤来贺，其《犀照和尚诗序》说：“犀照禅师为诸生时，有文名，痛甲申之变，遂弃举子业，而隐于禅。予雅慕其人，未能覩止，偶游庐峰，观瀑布、溯濂溪，考亭之胜迹，而询义门之遗址，与夫靖节之故居，盘桓月余，寓古承天寺，欲访犀照，而犀照已为逝波矣。予拊膺长叹，怅然不已。”^②汤来贺雅慕犀照和尚其人，知其逝世后，拊膺长叹，怅然不已，所抒发的也是遗民相惜之情。

明遗民交往的僧侣类型，显然不局限于是否具有遗民心态。奉佛遗民们更是大力护持，对禅门的接纳态度更为明显。这种接纳态度，自然会使得他们探讨禅门中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僧人编辑语录的问题，文德翼在《东岩禅师黄连语录序》里说：“己人亦有言文章盛而儒术衰，语录多而佛法少，其势不能不厉禁云。然要非通论也，使一喝三拳足明大事，一切有句都归默然，则百世而下，尚不知临济为何物，而况断桥哉？”^③便认为“语录多而佛法少”并非通论，触及到了文字与佛法的对立与调和。

世道人心又往往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文德翼在《药地炮庄》的序中写道：“此以毒治毒之法，而非炮则药不为功。三古以来，道德仁义、礼乐刑政之说，蕴毒于人心深矣。”^④赞扬《药地炮庄》是以佛法释庄子，治人心之毒。

^① 谢文淳撰：《程文山集》卷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0页。（《云居山志》选录此文，“恨生平不识颟愚状貌，当其哭时，不得身与其间，以自感发增益为疚”一句稍异，为“生平不识颟愚为何状，恨不得把臂呕血数斗为快”，感情更为强烈。见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58页。）

^② 汤来贺撰：《内省斋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2页。

^③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④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他的《书梵罗山册后》，从国家的僧牒之制度，发现了世事变化的细微之处：

“余于是而叹神祖之德深且阜也，二十年以前，岁度僧十万牒。当是时，即有彪羆，非尝辍耕太息，得寄生苾芻间，而贼何繇以起乎？近时执政□于大计，按僧头而责牒钱，至令侍御刻期，会寺僧奔竄以逃而吴越因以大变矣。盖天下事常起于微细而坏于庸人。”^①

虽然同为接纳的态度，但接纳程度的深浅却是有所不同的。黎元宽便是拜入竺庵大成门下，成为曹洞宗的在家弟子，文德翼则没有类似的行为，他在《与黎博庵》中写道：“闻博庵先生老而长斋，受人记剃，然弟闻圆通法门，挥扇看火，如是亲切而已，不曾受拂领杖。大丈夫自己出一头地，跼蹐鸡足，为他人守衲衣，尚不屑作，况近世之门风乎？”^②其实文德翼对近世佛门的风气不正，是抱有批判态度的，文章中也不乏直接显露的言辞，一句“况近世之门风乎”更是将这种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

文德翼、黎元宽等人是主动接纳禅门的代表，而同为明遗民的倪嘉庆和方以智则融合儒释，引人接纳。施闰章在《青原毗卢阁碑记》中说倪嘉庆“不专执浮屠说，随其高下，立中道引之。故出处之士，皆乐闻其言，往来徒众，尝千余人”^③。方以智的三教圆融思想则更为知名，清康熙三年（1664），施闰章以当地官员身份，开青原讲会，邀余颺主讲，方以智身为僧人，亦参与其中。余颺作《游青原记》记录此次盛会道：“越日，大会讲堂，九邑之士，云移雾歇。吴楚闽粤游人，凡作客吉州，无不至者。……夜宿招提方丈，愚山复与无可申论前说，诠解异同，穿穴洞贯。少焉呗寂钟响，灯烛茶冷，念此夕佳会，为官者、作客者、出家者，相聚一堂，雪泥鸿爪，真同幻梦。”^④

倪嘉庆和方以智圆融儒释的思想，也体现在了寺院建置和山志当中。倪嘉庆在青原住持时，除了修建寺院的主体殿阁，也募修了五贤祠、传心堂，用以提倡儒家思想，并认为“青原犹之匡山，贤祠犹之鹿洞也，堂阁周庑，宜依鹿洞规模而酌定之”^⑤。《青原志略》一书，特别设立书院作为专门一卷，虽然被

^①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49页。

^② 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29页。

^③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④ 转引自任道斌著：《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⑤ 笑峰大然编撰，段晓华、宋三平校注：《青原志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四库全书总目》视为“而其所采录皆理之近于禅宗者，则缁流援儒入墨，借以自张其教也”^①，但客观反映了倪嘉庆和方以智融通佛儒的思想。这种圆融的思想，带来的正是青原法门的兴盛。^②

(二) 抵牾排斥

对禅门僧侣持抵牾态度的遗民中，以宋之盛为典型代表。宋之盛早年好佛，后归于儒家，便对禅门多有抵牾，他认为“古有真儒，其成多在勘破禅后”^③。在《答毛尊素书》中，他更是表达了自己曾经亲近佛释的愧疚：“惕往者学无师法，喜以文字游戏随人应副。尝应禅者晦山之求，作《云居赋序》，依阿禅理，本惕罪案。不期过尘尊听，谬意野人可与参宗，远以《书义全提》委序。惕不自改，以应晦山者应之。既而悔曰：‘属在同人，不能勉效忠告，又从谀焉，罪滋甚矣。’苦道阻音阔，析疑无从。……既内讼失言，又佐成高明人援墨入禅之癖，若声惕罪而致讨焉，上刑何辞？”^④

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本，对禅门的思想和做法展开批评，便成为宋之盛与僧人交游中的重要内容，其《送禅者顿修归栖贤序》记载了与函呈弟子顿修今渐对于儒、释之理的讨论：

今甲辰夏，顿公复来访，则已再省其亲，甫自浙旋也。与接谈，甚欢。问及儒、释之理，顿公曰：“本来无儒、佛在。”余领之。复即顿公省亲一念，更仆不惮千里，益信此心同，此理同，质诸往圣而不谬，俟诸来今而不惑者，本来真无儒释在也。已问顿公：“释家有父母拜称弟子者，信乎？”则曰：“信。”问相见礼，则曰：“朔望参其师必拜，为重道也。”余恍然，始有疑心。既为重道，而已先枉其父子之道，此何道也？道率于性，达诸天下，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0页。

^② 秉持着圆融儒释态度的，除青原山净居寺两代住持外，另一座著名寺院真如寺住持戒显也是如此。他说自己“初年薄事理学，次游方外，深究宗乘，乃得洞明两家同一鼻孔”，但可惜“匿影云居，知音盖寡”。（《〈书义全提〉序》，见元鹏禅师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87页。）

^③ 《寿熊约生先生六十序》。（宋惕撰：《髻山文钞》卷下，《豫章丛书》集部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

^④ 宋惕撰：《髻山文钞》卷下，《豫章丛书》集部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6-807页。

无不知拜其父与兄也。此心同，此理同，质诸往圣而不谬，俟诸来今而不惑者也。故曰：“父子，天性也。”今且使父拜其子，即不知下拜时，子安而受之邪？亦不安而受之邪？若不安而犹受之，是违其天性，非所谓道也。苟安而受之，天性澌灭尽矣，又安得所谓道而重之乎？……顿公曰：“子所言者，迹也。迹有时异，心无不同。”……则心、迹之不得判为二，可知也。^①

在文中，宋之盛便借顿修往浙江省亲的事发挥，以父母拜称弟子的举动，批判佛教违反天性，阐明“本无儒佛在”的道理，其最终目的则是表明佛教应该坚持儒家传统中的道与理。^②对于禅门里一些行为的批判，还只是表面上的，深入到禅理的讨论，也并不少见。宋之盛《复约斋书》中，对罗钦顺《困知记》里“智见谓智”、“有天无地”等语进行了讨论，认为“禅之静正，六用不行，境智俱寂，离仁而言之也”、“盖仁者与物同体，而释氏知觉之心，耑用返照，不务格物”、“至于释氏之学有天无地，及其至也，无天无地，亦只形容其虚而无实，有圆无方，四大假合，又无方无实之一证耳”^③，更是将佛教与儒家看成了对立的两者。

^① 宋惕撰：《髻山文钞》卷下，《豫章丛书》集部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5-816页。

^② 其余文章，如《庐山纪事》，也详细写了宋之盛在游庐山期间与诸僧侣辩驳的对话，总体不出批判态度。

^③ 宋惕撰：《髻山文钞》卷下，《豫章丛书》集部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5页。

结语

江西向来为文章节义之邦，当处于明清之际那个特殊的时期，社会环境由最初的动荡不安，渐渐变成趋于平稳，文学思潮里张扬的个性还未完全褪去，对经世实学的推崇不断占据着主要地位，新朝与故邦、仕与隐的抉择长期拷问着士人的内心，正所谓遗民易作，老而为遗民则难。翻阅这一时期江西明遗民的文集，自然不能不注意到“江右三山”的同气相应，分布格局贯穿江西南北的三个学派，成为了江西明遗民团体学术、文学乃至社会交往的典型代表。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在论及明清之际江西禅门发展的时候，仍然不难从他们的文集里检阅到有关的材料，虽然这部分材料所占的比例很少，有的甚至是逆向的，即站在儒家一贯的道德立场上，对禅门展开这样或那样的批判，我们不妨将这视为儒家与禅门两种思想的交流与对话。

事实是，这样一群人在明清之际江西禅门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占有主要的位置，却也必不可少。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改换视角，从另一群人的文集里检阅这部分材料。符合条件的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的明遗民，包括遗民为僧者和浮屠中之遗民，另一类则是本地的明遗民。方以智和金堡等人，原本供职于南明永历朝廷，而后出家为僧，是典型的遗民为僧者。金堡有《遍行堂集》，可以考见其为僧后历程，方以智类似的文献则更多，《冬灰录》和《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记录了他为僧以后的言行，《青原志略》收辑了他晚年的诸多诗文。天然函是在明末出家，入清后又以遗民自居，他的《瞎堂诗集》，详细记录了他在庐山归宗、栖贤诸寺驻锡时的交游唱和和心理状态。这三位外来明遗民，均是声名显赫。禅门身份之外，函是著名的诗僧，澹归的词作向来为人称道，方以智则更是集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们在江西经营道场、募化乞缘，引得各类士人纷纷拥簇，即使上述的“江右三山”学派诸人，也不免与之交游往来，如“易堂”人士对方以智倍加礼敬，“程山”谢文淳游云居山时感叹晦山戒显是血性男子，“髻山”宋之盛与函是弟子进行佛理的辩论，都是明遗民在禅门之内交接的一些实例。

作为历来关注和研究较少的一个群体，江西本地的奉佛明遗民，在与禅门僧侣的交游往来上呈现出广泛而深刻的现象，对江西禅门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小

的推动作用。本文选取的三位对象，黄端伯、文德翼和黎元宽，都曾在浙江为官，这就为江西与浙江两地禅门的沟通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们的文集《瑶光阁集》《求是堂文集》和《进贤堂稿》均有大量关于江西禅门的材料，包括书信、募序、募疏、碑记等等。黄端伯的殉明行为，是对“以忠孝作佛事”的实践，他与慧经、天童、雪峤等禅门僧侣的交游往来，将明遗民与江西禅门关系的研究视野向前推至了明朝的最后一段时期，也为江西禅门在清初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德翼和黎元宽则在清初的十多年时间里，在坚守遗民之志的同时，护持禅门，两人投身禅门的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是江西禅门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这两股力量，因为一个共同的环境，在一个既定的范畴内，生发而出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明清之际江西禅门繁盛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在法门传承、寺院修建、文学创作、寺志编修和思想交融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曹洞宗一枝独秀，具体来说则是寿昌系下觉浪一脉和道独一脉的灯火不熄；各地寺院经过战乱之后，纷纷鼎故革新，重焕生机；士僧往来唱和的诗文也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文学的创作与交流；《青原志略》和《云居山志》等佛教史志的编纂，保留了这些寺院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儒学与佛学的交融会通，即使是抵牾排斥，也活跃了江西的思想氛围。种种这些，正是明遗民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对江西禅门所作的贡献。

致 谢

与其说是致谢，不如说是告别。

记得论文完稿之初，内心的激动与忐忑久久不能平复。当天夜里，便收到了导师段晓华先生赠予我和同门陆坤同学的诗作，诗中有“岂惟青锋捎云薄，更待丹山哕凤频”之句，将我俩喻之为青锋，与当时寒冬未尽、暖春在望的时节颇为贴切，想到即将面临毕业，更广阔的天空、更长远的发展亦可企及，先生之期望不可谓不厚。直读到尾联“有志登高君莫固，要凭心量眺无垠”，内心更是振奋不已，但又随即转而愈加复杂，是不舍，是感动，难以说清。这三年的求学生涯，获益良多，与良师益友的帮助是离不开的。

首先是毕业论文的完成，非我一人之力，有几位老师最需感谢。研究生阶段伊始，有幸参与王德保老师主持的“江西禅宗名刹研究”课题，这是本论文最初的缘起。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先后拜访了南昌佑民寺、靖安宝峰寺、青原净居寺、宜黄曹山寺、永修真如寺，在靖安宝峰寺期间，恰巧南昌大学的退休教师熊重生老先生寓居于此，老先生好与青年学子交流谈心，也曾和我畅聊人生与未来。在老先生的介绍下，得以在宝峰寺小住几天，也因此借便在寺内的江西佛学院图书馆看了几日书，发现了几本不易找到的典籍文献。而对论文写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自己的导师，导师对词学的研究声名卓著，在地方文献和禅宗等方面也是学识深厚。商量选题时，导师便建议我坚持江西禅宗的研究方向，当我将研究的时代背景确定为明清之际后，导师又与我详细讨论了论文的体例和研究内容，并借予我张晖的著作《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和自己点校的《遍行堂集》。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导师的精心指导和细心修改，导师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自己学习并一直秉持。此外，正式开题时，王德保老师建议我阅读赵园的著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罗春兰老师提出了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均是中肯之论。

研究生阶段的诸多课程，对自己的学识增长和学术习惯养成影响至深，在这里仅对教授过我的几位老师表达谢意。段晓华老师训练我们古典诗词的写作，每星期交作品一篇，诗词非我所长，故每周都“倍感煎熬”，但最后也能把诗词写得像模像样了。王德保老师引导我们研读《资治通鉴》，每次上课，一桌人畅谈古今，有召开“国家大会”之感。罗春兰老师讲授《续修四库提要》，

致谢

鼓励我们发现问题，并走上讲台讲解，锻炼了我们的言语表达能力。吴晓龙老师介绍唐前小说，涉及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知识，令人耳目一新。除此之外，研一“蹭”了李精耕老师一个学期的课，收获颇丰；选修肖徐彧老师的外国文学课，目睹了年轻老师的风采。师恩绵长，一生铭记。

同窗情谊，也令人难以忘怀。谭雅琴同学、兰健同学、陆坤同学、严思远同学，共属文献学专业，一起学习，一起欢笑，因为课题的关系，还进行了一场江西禅宗寺庙之旅。文字学的刘欢同学、马启超同学，共住一寝，彼此包容。古代文学的魏亚冲同学、叶国云同学，关系也很密切。

最后，“厚颜无耻”地感谢一下自己，感谢一直默默坚持的自己。大学所学并非文科，而是金融。当时决定跨专业考研时，考虑了很多事情。准备一场自己完全陌生的考试，投入大量的时间，能否考上？坚持自己的爱好，由热门的专业跨入冷门的专业，是否值得？当考虑完所有的情况后，也愿意承担年轻时为理想付出的种种后果，便也义无反顾地备考，幸而最终一切都还顺利。由于专业基础的薄弱，在三年的学习生涯、在毕业论文的撰写上，自认为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想起去年暑期一个人在寝室整理材料，想起今年初春辞去得之不易的实习回校修改论文，也想起三年的苦与乐，想起课余时间不停录入、标点、校对各种古籍的那些时光，这也算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行文至此，又不能不感谢自己的父母，当别人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而自己的孩子还未步入社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看着他们日渐衰老，自己却还没有安定下来，总不能不怀有愧疚。毕业之后，便将进入金融系统工作，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但以前苦苦思索的“是该把爱好当成职业，还是仅仅作为爱好”，我想我又有了新的答案。

一个阶段的结束，一些人和事的暂别，愿彼此安好。

熊 超

2017年5月4日

参考文献

1. 古籍文献：

- [1] (清) 林时益辑, 《宁都三魏全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4、5、6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2] (清) 熊文举撰, 《雪堂先生集选》[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33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3] (清) 徐芳撰, 《悬榻编》[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86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4] (清) 方以智撰, 《浮山文集前编》《后编》《别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13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5] (清) 沈寿民撰, 《姑山遗集》《昔者诗》[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19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6] (清) 金堡撰, 《遍行堂集》《续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27、128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7] (明) 文德翼撰, 《求是堂文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41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8] (清) 钱澄之撰, 《田间文集》《诗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44、145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9] (清) 黎元宽撰, 《进贤堂稿》[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45、146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10] (清) 释成鹫撰, 《咸陟堂文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49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11] (清) 姚佺辑, 《诗源初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69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12] (明) 张溥撰, 《七录斋集》《论略》[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182册, 北京出版社, 1998
- [13] (明) 黄端伯撰, 《瑶光阁集》《外集》《明夷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193册, 齐鲁书社, 1997
- [14] (清) 李元鼎撰, 《石园全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196册, 齐鲁书社, 1997
- [15] (清) 汤来贺著, 《内省斋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199册, 齐鲁书社, 1997
- [16] (清) 谢文淳撰, 《谢程山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209册, 齐鲁书社, 1997
- [17] (清) 毛德琦撰, 《庐山志》[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239、240册, 齐鲁书社, 1996

参考文献

- [18] (清) 陈弘绪撰, 《陈士业先生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 第 54 册, 齐鲁书社, 2002
- [19] (清) 陆世仪撰, 《复社纪略》[M], 续修四库全书, 四三八·史部·杂史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0] (清) 曾灿撰, 《六松堂集》[M], 四库未收书辑刊, 柒集·贰拾伍册, 北京出版社, 1997
- [21] (清) 张廷玉等撰, 《明史》[M], 中华书局, 1974
- [22] (清) 聂先编撰, 心善整理, 《续指月录》[M], 巴蜀书社, 2005
- [23] (明) 方以智著, 邢益海校注, 《冬灰录: 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M], 华夏出版社, 2014
- [24] (清) 天然和尚著, 李福标、仇江点校, 《瞎堂诗集》[M],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6
- [25] (清) 澄归和尚著, 段晓华点校, 《遍行堂集》[M],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8
- [26] (清) 钱澄之撰, 汤华泉校点, 《藏山阁集》[M], 黄山书社, 2004
- [27] 陶福履、胡思敬原编, 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整理, 《豫章丛书》集部十[M],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
- [28] (明) 方以智编, 张永义校注, 《青原志略》[M], 华夏出版社, 2012
- [29] (清) 笑峰大然编纂, 段晓华、宋三平校注, 《青原志略》[M],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30] (清) 元鹏禅师编纂, 何明栋、卢川校注, 《云居山志》(合订本)[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31] (清) 范昌治编订, 《庐山秀峰寺志》[M], 中国佛寺志丛刊, 广陵书社, 2006
- [32] (清) 陈弘绪等撰, 段晓华点校, 《江城名迹记·江城名迹记续补三种》[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2.今人论著论文:

- [1] 段晓华、刘松来, 《红土·禅床: 江西禅宗文化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2] 韩溥, 《江西佛教史》[M],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 [3] 蒋维乔, 《中国佛教史》[M], 岳麓书社, 2010
- [4]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岳麓书社, 2010
- [5] 李勤合, 滑红彬, 《庐山佛教史》[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 [6] 罗炽, 《方以智评传》[M],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7] 任道斌, 《方以智年谱》[M],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
- [8] 释一诚主修: 《云居山新志》[M],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 [9] 孙静庵, 《明遗民录》[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10] 汪宗衍, 《明末天然和尚年谱》[M],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温聚民, 《明魏叔子先生禧年谱》[M],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
- [12]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 中华书局, 1982
- [13] 谢国桢, 《南明史略》[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14] 谢正光, 《明遗民传记索引》[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5] 余英时, 《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参考文献

- [16]张晖,《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7]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8]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19]曹刚华,《方以智晚节考补》[J],《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
- [20]成娟阳,《文德翼传记文初探》[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 [21]冯国栋,《山寺志文学文献的价值与局限——从山寺志书所载王安石佚诗说起》[J],《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
- [22]封强军,《方以智挂锡庐山期间活动述略》[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3月
- [23]胡迎建,《八大山人与禅宗》[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0月
- [24]李文胜,《论明遗民易代之际生存的怪异现象》[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2月
- [25]陆林,《清初姚佺评选〈诗源〉的时代特色》[J],《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 [26]马将伟,《用世与遗世之两难:曾灿逃禅考论》[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2月
- [27]孙国柱,《二十世纪以来天然函呈禅师研究综述与问题聚焦》[J],《佛学研究》,2013年
- [28]萧鸿鸣,《曹洞临济两兼之——有关八大山人与禅门关系的几个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10月
- [29]邢益海,《方以智研究进路及文献整理现状》[J],《现代哲学》,2013年第1期
- [30]杨权,《清初岭南禅史研究与佛教文献整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31]张永义,《〈青原志略〉成书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 [32]周锋利,《青原学风与方以智晚年思想》[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33]崔晨,《方以智僧后交游考》[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 [34]胡冰洋,《释澹归交游考》[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35]李精耕,《明代江西作家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36]刘学贵,《明代文人与庐山关系考述》[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37]刘雪梅,《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38]汪青,《方以智晚年人生定位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 [39]王尤清,《思想传承与文化重构——贵州南明遗民逃禅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40]肖敏,《清前期江西明遗民社会交往研究》[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41]姚良,《金堡及其〈遍行堂〉词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42]张夸,《清初吴中遗民僧及其文学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43]吴怿,《文德翼生平著述考》[C],《江西省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12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已发表论文：

1. 《云居山志》僧俗交游诗考论[J]. 地方文化研究, 2016, 3: 103-112.

已出版专著：

1. 江西禅宗名刹文化研究[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8. (参与编写)
2. 庐山山南二古寺志[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 5. (合作整理)